

# 目 录

## 我们的村落

- 韩森寨村 ..... (3)  
胡家庙村 ..... (7)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王玄策——唐初三出使印度的使者  
..... (11)

## 学术交流

- 记述古城辉煌 传承中华文化  
——《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序言  
..... 张岂之 (12)

- 让历史文化记忆烛照未来  
——评《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  
..... 刘 宁 (14)

- 一本全景式展现西安历史文化的专业书籍  
——评《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  
..... 王永莉 (16)

- 戒奢尚俭 养德兴国  
——关于“秦亡于奢”的联想 ..... 姚敏杰 (18)

## 人物春秋

- 辛亥革命的先烈——王绍文 ..... (21)

## 史料钩沉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23)  
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 (25)  
张学良西安事变前后心迹 ..... (28)  
“节俭”的道光皇帝 ..... (29)  
陕西书院简述 ..... 史飞翔 (32)

## 西安风情

- 西安城门趣闻(五)——文昌门 ..... (33)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 (36)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高陵曲子 ..... (富小云 整理) (37)



## 西安地方志

2014·第2期

(总第227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文史拾趣

- 马年说姓马 ..... (39)
- 中国古代的生育政策 ..... (40)
- 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 ..... (41)
- 古代官员任职回避原籍制度始于何时?  
..... (42)
- 古代出书也“炒作” ..... (44)

## 志鉴动态

- 在临潼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姚敏杰 (46)
- 在第二轮《西安市志·文物分志》评审  
验收观摩会上的讲话 ..... 张 帆 (47)
- 吴义勤副市长调研西安市地方志工作  
..... (50)
- 《灞桥区志》复审会召开 ..... (50)
- 临潼区 2014 年档案地方志工作会暨业务人员  
培训会召开 ..... (50)
- 《西安市志·文物志》通过分志初审验收  
..... (51)

## 知识窗

- 古代的人工降雨 ..... (52)
-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含义 ..... (52)
- “椿萱”原来指父母 ..... (53)
- “寻常”本是度量单位 ..... (53)
- 中国古代第一个有年号的和在位时间最长  
的皇帝 ..... (54)
- 建都西安登基最年幼的皇帝 ..... (54)

## 历代诗人咏长安

- 《终南山》 ..... (唐)王维 (55)

## 解字

- “史” ..... (27)
- “右” ..... (31)

## 名句欣赏

- 【贵义而不贵惠 信道而不信邪】等五句 ..... (24)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 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 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http://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mailto: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城改前的韩森寨村

## 韩森寨村

地处西安近郊城东,距古城东门五里多,曾有“七里漫道八里坡,韩森寨离城五里多”之说,是一个久负盛名、历史悠久的大型村寨。由村里现存的古物古树推断,远在秦汉时,这里就有人家。村西北角高丘之上的韩森冢,就是秦时兴建。它又是古城的制高点,历代各界文士骚客,经常登高望远、遣兴抒怀。站顶远望,城内外很多文物景观尽收眼底。如南面的终南山、大雁塔,东面的骊山晚照、白鹿原、灞灞二水,都清晰可见。在军事上,它对西安古城的城防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村东南角上的万寿寺,为唐时

所建,是历代君主王公大人及佛教僧员经常拜佛祈福的著名寺院。地处如此视野广阔、交通方便、风景优美之所在,可谓得天独厚。况且村周良田沃野,利于农耕,因此历史上村民较为富庶。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韩森寨周边大小工厂林立,企事业单位众多,一片繁华。韩森路由东向西贯穿而过,将韩森寨村分为南北两片,南接咸宁路,北临长乐路,东接幸福路和万寿路。2012年统计,韩北村1921人,韩南村572人,韩森寨村合计2493人。

村名来历有两种说法。1.韩森寨古名皇孙寨。公元前91年,汉武帝之孙刘进,在“巫蛊

## ●我们的村落●

之狱”中冤死。后刘进儿子刘洵于公元前 74 年继位,称为汉宣帝。宣帝将父刘进封为悼皇帝,改葬于今韩森寨村西,称皇孙冢。后讹化为韩森冢。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 65),为了奉悼皇帝陵园,在此设奉明县,至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 4)撤销。韩森寨作为县城历时 61 年。2.据传韩森冢之上还有一周秦大冢。楚汉相争,刘邦先入咸阳,经过鸿门宴事件后,被封为汉中王。项羽大军到咸阳,行至韩森寨地区,欲开掘大冢筹集军饷,村民为保护大冢,便以揭秦盗坟为仁礼不德,故尔跪祭大军行至的路旁,向队伍诉求:“这冢内埋的是一个叫韩森的大医生,为村里看病,不收费,恩惠四方,先生死后,为报恩谢德,但堆冢封坟。”这些话保住了韩森冢,也因此得名。

村民姓氏不易追本溯源,据不完整统计,大致从清代到民国有周、王、杨、惠、任、贾、张、邵、郭、董、蒋等十几姓。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东关龙渠堡迁来洪姓一家建房置产,遂成为村中四大家之一。据传,任姓来自长安任家坡,贾姓来自长乐坡,王姓来自红庙坡,惠姓来自长安咀头村,郭姓和周姓来自薛家园子,其余均系世居老户,解放前夕,又迁来陈、栗、刘、胡、李几家客户,当时是租房居住,打短工谋生。

清朝乾隆年间修订的《咸宁县志》记:韩森寨归属咸宁县。当时县下区划为 29 个社,韩森寨村归韩森社管辖。韩森社东邻狄寨社,南接原兴社,西挨东关社,北到翰珥垛社,共有 42 村。大约到清同治光绪年间,区称又作了变更,社改称仓,韩森社改为韩森仓,仓下面再设村或社,共有 36 村。韩森寨以村大(共 192 户)下分西、南、中、北四个社。西社辖十字、下场、薛家园子、涝池边头、王家涝子五个自然村。南社辖东邦、南邦。中社辖上巷子、下

巷子。北社辖宋家巷、香坊、北堡子。1986 年《西安地名志》记:韩森寨七村原名迎祥堡;焦家什字(以姓氏得名),解放初亦名韩森寨三村和焦家上场、焦家下场;薛星堡,原亦称韩森寨四村和涝池沿、王圪崂;高家巷,亦称王家巷、王村;宋家巷,原名韩森寨六村。

各社推选出乡约一人,组成村委会,共议村政大事。由全村 192 户推选出大头、会计、地方各一人,处理村中日常事。大头管理村政,执行村委会的决议,召集村委会开会。会计管理村中财务。地方即通讯员,跑腿、传达村令,催办村上工作。另外,各小巷道设小头一至二人,负责各小村事务,是村上最基层的干部。大头、会计、地方每年改换一次,在本村 6 月 19 日会后,即日交接,经村委会监交。小头是每年正月 15 日在各小巷村民会上交接。村政安排有序,条理分明,且有民主风气,发挥了互相制约机能。不论乡约、大头、地方、小头,都是义务制,延续了或有百年。

北伐胜利后,仓社取消,建制改为联保制。韩森寨属长安县韩森联 6 保,下辖 13 个甲,保有保长,甲有甲长。户口增加到 240 户,虽经天灾人祸,仍保持 1000 人左右。抗战胜利后,西安成为院辖市,韩森寨划为第十区第六保,甲的编制未动。

西安解放后,韩森寨的行政划分为十区



城改前的韩森寨二村



城改前的韩北村

三乡，区政府在胡家庙。1953年初，红光高级蔬菜农业合作社成立，归属于长乐区，韩森寨为乡。1956年至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取消了乡村的行政划分，村为大队，韩森寨分为七个村，也就是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60年，城市人民公社成立，归属于灞桥区长乐公社，由十里铺分社管辖。1962年，取消了城市公社化，韩森寨由十里铺公社划归到等驾坡公社，属雁塔区管辖；韩森寨村改为生产大队。1965年10月，等驾坡归属郊区。1980年4月，西安市撤销了郊区，又划归到雁塔区。1982年初，韩森寨由等驾坡转归兴庆公社。1983年，兴庆公社由新城区接管，韩森寨由新城区农副业管理局辖制，韩森寨改建为村委会，分为南北村委会，生产小队为村民小组。2009年11月，韩北村作为撤村建居试点村率先转为社区，即韩北社区，2010年8月，韩南村转为韩南社区。

解放前，韩森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破旧村庄，只有190余户人家，1100余人，守着不足70顷的耕地，大多数人过着贫苦生活。只因距西安城较近的有利条件，部分村民在农忙后的闲余时间，做一些小生意，开小店铺、手工作坊，经营小型的车马运输，而大多

数人则以挑担卖凉粉为生养家糊口。

由于北村规模较大，一切事务占主。韩森寨北村有史以来形成7个自然村，划分13个村民小组。1995年，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7个村民小组转为城镇居民，剩余6个村民小组。2007年统计，村民639户、1874人。

为了解决人口多、土地少的矛盾，韩北九队经长时间的运筹规划，决定走都市化道路，建设村民住宅小区。1995年5月起，韩北九队筹建小区工作小组，首先将地处村东与高楼村相邻的八亩农田作为新建小区的基地，相继办理有关建房审批、筹集资金、图纸设计和寻求工程承包等。在解决筹集资金问题上，采取了一方面向银行贷款200多万元，另一方面同承包工程的高陵第二建筑公司商谈请对方先垫付部分资金，以应急需。1998年12月8日，新建的“幸园小区”工程竣工。该小区楼高七层，总建筑面积为14000多平方米，安置居住村民126户。

城改前，韩森寨南北两村几乎家家拥有小楼，以出租房屋为主，且生活环境得到很多改善。村民们曾高兴地说：马路纵横交通便，高楼林立路两边，村里道路修平坦，下雨不把胶鞋穿，庭院楼房都盖满，自来水接到院里边，有线电视通房间，客厅沙发摆墙边，时尚家具好几件，电话放在茶几边，如今通讯真方便，有事不用把门串，打个电话就说完，家用电器样样全，时尚衣服身上穿，客厅坐下吃顿饭，老人脸上红光显，养老金月月能兑现，不给儿女添麻烦，精神文明记心间，村容村貌展眼前。

韩森寨北村两委会早在1997年就开始酝酿，制定建设村民住宅楼，研讨韩森寨北村村中村改造。2004年，西安市将旧村改造列入工作重点计划项目，按照城中村改造“自筹资金，自我改造，自我安置”的原则，有步骤地实

## ●我们的村落●

施。城中村改造首先要实现“四个转变”，即：农民转为居民，村庄变为社区，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集体经济转为混合经济，使村民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向城市化、市场化方向转变。韩北村成立了城中村改造责任有限公司，对本辖区进行了全面规划。计划一期在幸福中路区政府工业园预留给村民 20 亩国有土地，建 4 栋高层，安置村民 420 户，节省土地面积 120 亩；二期在咸宁东路建八栋小高层楼房，占地 24 亩，安排 320 户村民入住，节省土地 150 亩，利用旧村的土地为村民生活作长远打算。

按照预期设想，第一、二期工程竣工后，可安置旧村的村民。根据西安市政府关于城中村改造有关规定政策，改造后，每个村民可获得 30 平方米的住宅面积和 35 平方米的经济收入保障面积，全部计划可 6 年完成。韩北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全部建筑按照市规划设计院设计标准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住宅楼安装电梯、天然气、自来水、电话、闭路电视、供热设备等设施，并留有足够的空间，一是建设绿化、采光、通光、消防以及停车等必要之公共设施，二是建设公益设施，如喷泉、园林花、铁艺围墙等，形成住宅花园。

2007 年 8 月 15 日，在市、区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一期工程同广东韶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顺利签订了合作协议，韩森寨村城中村改造工作全面启动。截至 2012 年，韩南村已整体拆迁完毕，韩北村基本拆迁完毕。

根据老人记述，大约在清末，村中有学识之人出于热心教育事业，立馆施教，经费、薪俸均由村民自发筹集。按老师当时教学情况看，可分为如下方式：1.古代沿传的尊严式。课程为：初蒙设《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千字文》、《孝经》。进而为《中庸》、《大

学》、四书、五经、春秋易礼等。教学方式是死背硬记。2.新旧结合式。在上述形式的基础上，增添不多的新内容，有白话体，并宣扬民初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科学道理。3.完全新形式。分班分级，以学年分初、高层次两级。按课程分门别类，设专职教师。教学内容采用民初教改课本。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灌输，注重科学知识技能的培养。还上体育，打洋鼓，吹洋号。春秋两季实行野游活动。那时每年 8 月中秋、冬至日都要为老师送礼，老师招待学生就餐，放假一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同学们集钱买礼物敬俸孔子节，团拜、会餐。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战争连年不息，大城市近郊受害尤甚。既无发展教育之机遇，又无受教育之环境。所以造成村中文盲和半文盲占村民人口的 90% 以上。

“七七事变”后，西安遭到轰炸，市内各大中小学被迫疏散，市内化觉巷小学很多老师住在韩森寨村，他们惋惜学生失学状况，经与村多次接洽，将化觉巷小学迁来，占用三圣宫、永福庵、宋家巷等数座庙院，设立不少班级。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城内，村上教育又成为空白。时任村联保主任张俊杰在全乡群众的要求下，决心承办学校。以唱大戏等形式筹谋资款，拆小庙建筑校舍，并在长安县政府备案，最终成立了韩森寨小学。当时学生只有百十名，而女生极少。21 世纪，小学生人数已增至 1300 多人，设班级 24 个，教师 50 余人，是新城区的先进学校。培养大学生几十名，中学教育已普及。

村域内有几处古迹名胜。1.万寿寺——公元 767 年 7 月，大宦官鱼朝恩捐献其在城东的庄院修建成章敬寺，为章敬太后荐福。寺中殿宇 4130 余间，共 48 院，其规模与武则天女

儿太平公主的山庄大致相等。公元 768 年正月,唐代宗亲自到章敬寺拜佛,当时寺中共有僧、尼约 1000 余人。明代重修,建起藏经塔一座,改名为万寿寺。解放后在万寿寺东侧开辟南北道路,被称为万寿路(万寿路由来)。2.石碑一方——该石碑曾坐落于韩森寨四村村口,始建于 1661 年(清顺治 18),碑身尺寸 2.2m×0.86m×0.255m,碑座下底宽度为 0.56m,

上底宽度为 1.02m,碑体用青石构筑。3.五马石——五马石寺庙位居秦岭终南山森林公园内,南五台以北,奇花异草,林木茂盛,风景秀丽,归该村所有。1993 年,该村对寺庙进行了重新修建。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有五马石庙会,众人烧香祈福,游山玩水,其乐无穷;有诗描绘:深山林茂寺庙多,鼓乐香火冲云霄;终南五台在险峰,五马奔腾齐欢乐。



城改后的胡家庙一村

## 胡家庙村

位于西安城东北角三公里处。交通线路四通八达,北邻陇海铁路,东邻西临高速公路,正南为古老的金花路,金花路和长缨路相互交叉而过,形成了胡家庙什字。城改前,胡家庙村的位置正处于什字路口交汇处的西北角,二环金花大桥由村口南北横通穿过。解放前的胡家庙村,交通不发达,出行受阻,只有一条由十里铺——昆仑厂——东郊果园(长乐罐头厂)——南张——“东窑坊”——东关的一条初级石子公路,村民要去城里出售农产品,最近的路程也要经过三府湾村,经过土匪时常出没的道士坟(现在的第四军医大学教学楼)。

胡家庙史上被胡家庙人俗称为大庙,其位置在西安市七十二中斜对面、公路北侧,临近唐都家具市场。传说唐“安史之乱”时期,胡姓官员参与平叛,最后家族被叛军所灭,后人

为纪念胡姓官员特为其修庙,此即胡家庙名称的来历。后世依庙而居,由庙得名,故有胡家庙村,此有待进一步考证。

胡家庙无量庙(供奉无量寿佛),位于城改前胡家庙二村东口大门外,马王庙位于西口大门外,村两头均设有大门。遗憾的是,1954 年拓建长缨路、金花路时,不得已拆毁。

据传,祸起安史之乱,胡姓被满门抄斩。后来定居村民是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来的,已无法考证。胡家庙村的姓氏结构形成来自于不同的朝代,有的间隔了几个世纪,但有据可查。湖北省阳新县地方志记载,陈姓一部向福建移去,而另一部移至关中,迁移路线穿越秦岭山脉,途径柞水来到秦岭北部,如秦岭山下的金潭沱村。陈姓在长途迁移中有病倒的,就地留下治疗,所以柞水山道沿途陈姓村

## ●我们的村落●

庄较多。胡家庙村的陈姓为数也不少,有陈半截之称;又如胡家庙村中人口最少的马姓,清末年间,马大旗在清军任旗牌官,平时随身携带一面令旗,经常骑马来回穿梭在清军各大营之间,时间久了,人们称为马大旗,马大旗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马上功夫了得,既得满人摔跤术,又酷爱武学的各路兵器,拳路真传,武艺超群,时常为百姓抱打不平,在群众中威信高,口碑好。在胡家庙村人帮助下,其在村内购置了土地和宅基,生息繁衍至今。又如樊姓人家,1929年河南遭蝗灾,庄稼全毁,一樊姓人家举家逃难来到西安,初始在田间帮工干农活,也帮人织布,最后在村中扎了根,并成一大户;和樊姓相似经历的还有:李姓、张姓、林姓等,这些人中,有的从事手工业,还有的从事养殖业等。

另外,说到新城村史,似乎就不能不提鄂尔多。据2005年秦孟街最新出土石碑记载,鄂尔多是大清军营将军,八旗子弟,由于屡建战功,清政府将韩森寨村以北十三个村作为封地奖给鄂尔多,其大营驻扎地就是秦孟街,鄂尔多在统辖的封地征收军粮及税务,除上交朝廷外,其余归其所有。至今还有一首民谣流传在这十三个村:“鄂尔多十三村,个个出来卖凉粉,胡家庙应了个名,韩森寨卖得红”,这首民谣胡家庙村上年纪的人都会说。分析民谣中的意思,胡家庙村虽距城较近,但经商方面还是稍逊于韩森寨村人。

胡家庙村原本属一个整体的自然行政村落,由于村中有两条巷子,前者称为前村,后者称为后村,为了便于管理,逐步演化到后来的一村和二村。胡家庙村核算单位是以村集体形式为核算单位,一村是一个核算主体,二村同样是一个核算主体。一个胡家庙村,两个行政主体,对外称为胡家庙一村和胡家庙二



城改前的胡家庙一村

村。解放初成立初级社时,胡家庙一村180人,胡家庙二村300人,合计不足500人。2012年统计显示,胡家庙一村442人,胡家庙二村608人,合计1050人。

胡家庙行政村是如何建立的呢?据马志忠老先生回忆(口述),1949年6月份正割麦碾场的一天,早上国民党军队向南山(秦岭)撤离,下午就有雷、冯、郎、权四姓的解放军战士,身着军装,肩挎干粮袋,手提步枪就进了村,召集村民,宣布解放,并动员村民向共产党靠拢,同时宣布土改工作组进村,全面展开了人民政府在胡家庙村的工作。接着,成立了农会,设立了7个互助组,建立了党支部,并协同南北张家庄村、三府湾村建立了民兵营;当时的行政归属是第十区、第十乡,十区区政府在今天的胡家庙办事处地址上,而第十乡的乡政府设在铁道以北的老君庙(后乡政府迁到十里铺,老君庙改为鄂尔多小学),同时在民兵营设立了派出所(由一名解放军战士任民警)。

胡家庙村行政归属发生过很大变化,过去的第十区变成了灞桥区,乡政府改为红光人民公社,其后人民公社依次更名为燎原公社、兴庆公社,最终划归新城区管辖。

1952年,成立综合社和农业合作社,综合社主要成员来自养殖户、手工业者和帮工之类的人员,而合作社成员则来自胡家庙村原住址



农民(有地者)。农业合作社的章程门槛太高,经多次修改后演变为人民公社章程和农村工作60条,但无论怎么修改,有一条始终没有改,这就是入社的必备条件,即:必须有生产资料(指土地)和大型生产工具(指车、骡、牛、马)。

1955年秋季的一场连阴雨,在苗铺路方向流来的雨水冲击下,造成胡家庙村深受水害,几乎每家的房子都进了水,房屋纷纷倒塌,损失惨重,民兵营组织人员白天巡逻观察涝情,排涝救人,夜间各村巡视,起到了抗涝救灾的关键作用;因为大水来得突然,人们纷纷逃到新建的张家庄小学,由民兵自行管理。此次灾难共损失房屋68间,各户门楼几乎全部倒塌,死亡1人,是解放后胡家庙村经历的一次较大自然灾害。

1956年,政府动员群众综合社与合作社两社合并,成立了高级社,也就是人民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根本上解决了综合社没有土地吃粮难的问题,从政策上和生活上保证了每个人有饭吃、有活干,体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当时高级社就设在胡家庙一村。

胡家庙村高级社成立后,由于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社里购置了锣鼓家伙和高跷,男性青年踩高跷、绑信子,女性也组织了秧歌队,还排演了地方先进戏剧,如《梁秋燕》《小二黑结婚》等,除了庆祝高级社成立演出之外,还被调去其他村庄巡回演出。逢年过节高跷队、秧歌队、锣鼓队,在周围村庄都留下了胡家庙村演出的足迹,平时仲夏季节,村民自娱自乐,以板胡、二胡、三弦、扬琴等乐器,组成汇演的秦腔排子曲。

1958年大跃进时期,村上农民吃饭的铁锅几乎全部砸了,支援了工业建设,胡家庙村办起集体食堂,食堂地址就是城改前的胡家庙二村村委会。当时铺张浪费现象极为严重,

在农村种麦季节,用车拉麦种子,种到地里的麦子密度相当于正常种植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造成大量的粮食浪费。来年春,由于麦子过稠,无法生长,社员在田间又得拔麦苗,这一不遵守科学种植的举动,为1960年自然灾害埋下了痛苦的伏笔。当时村上的宣传画,有一张是用汽车拉两个南瓜,如今看来极具讽刺意味。

1960年,胡家庙前后村发生矛盾,只好分队,实行集体两级核算,胡家庙前村为一队,胡家庙后村为二队,当时的高级社改为胡家庙生产大队,集体财产平均分配给两个小队;但胡家庙前村劳动力少,经大队调解,将后村王姓几户划拨到前村,这就是胡家庙二村村民中有部分隶属一村的原因。

1964年至1965年,胡家庙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即进行忆苦思甜。

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胡家庙村的经济也跌入了低谷;胡家庙一村年终分配每个劳动日5毛钱,而胡家庙二村更惨,每个劳动日仅有三毛二分七厘,胡家庙前后村的人,无论你怎么干,年终全部都成了欠支户。人民公社期间胡家庙村属计划经济,每年由公社下发指标,种萝卜、种白菜,种多少亩,全部由公社计划,下发种植指标种出来的菜全



胡家庙二村村城改中

## ●我们的村落●

部送往菜场,由菜场划价,属指令性的经营种植,村中仅有的副业就是豆腐房,社员全靠豆腐房挣钱吃粮,每人每月 27 斤半口粮。粮食由集体在粮站购买,拉回粮食后,发放的方式是:每人每个劳动日带半斤口粮,而劳动力少的,孩子多的,平均每人只分到十来斤原粮,这就是粮食分配后大多数菜农缺粮吃的根本症结所在。

胡家庙前后村旧的问题虽一时解决,但 1972 年胡家庙一、二队合队又分队,之后双方因二级核算又引发了纠纷,经公社调解,取消胡家庙生产大队编制,成立了胡家庙一大队与胡家庙二大队两个独立经济核算主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稳地过渡了几年。1982 年,生产队解体,改为村委会,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土地下放到农民手里,彻底实行了农民自主经营,胡家庙村的村民经济条件好转,口袋慢慢有了钱。自此,村民各家各户拆掉瓦房,改建楼房;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因为不再划拨宅基地,城中村村民开始了向高层楼房建设的探索发展,房屋出租成为一大经济来源。

杨森制药公司征地对该村影响最大,使村民生活土地急剧减少。当时,胡家庙市场就在村口,对村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房屋出租一项,每平方米都比其他地区同类房子多租收几块钱。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胡家庙村也已相应地由一队改为一村、二队改为二村。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土地面积日益减少,在大胆摸索市场经济的规律后,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胡家庙二村筹建了万寿路调料市场,为胡家庙村大踏步走入市场经济开拓了先例。2001 年,胡家庙二村又修建了胡家庙二村旧货市场,市场建成后,当年见效,第二年紧接着又修建了胡家



胡家庙二村的锣鼓队

庙二村综合市场。

2010 年 4 月,胡家庙村转为社区,分别为胡一社区、胡二社区;目前城改工作也进入攻坚阶段,按时限村民有望于 2012 年下半年实现回迁。

1954 年,在政府的规划下,一为铺设新路,二为村上孩子能得到正规教育,将大庙拆除,搬迁到南张家庄村,即现在的张家庄小学,大庙拆迁前胡家庙村人已经将大庙改建成为学校,也就是胡家庙小学。同年,胡家庙村开展了扫盲运动,办起了识字班,建立了东学教室。1955 年,又建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可见,胡家庙人对村民及子女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从小抓起。时至今日,义务教育更是得以普及,大学生、中专生比例增加,村整体文化素质全面提高。

由于人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解放后,以李钟秀、陆少宣为首的知识分子,开办了胡家庙中医院,成为当时继一所陆军医院后开办的西安东郊第二所医院,为以后建立十里铺骨科医院打下了坚实基础。主治骨科的医师多是李钟秀、陆少宣的徒弟,秉承了李钟秀对骨科理论的真传,其中有米家崖村的赵姓徒弟,也有新房村的钟姓徒弟,尤其还有胡家庙村的樊姓弟子。

# 王玄策

## ——唐初三度出使印度的使者

在唐与天竺(古印度)文化交流史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自然首推玄奘(俗称“唐僧”)了,加之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渲染,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然而,除了玄奘之外,还有一位与其同时代、对唐与南亚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曾经三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

王玄策,洛阳人。唐太宗时,曾为黄水县(今广西罗城西北)令。贞观十七年(公元643),首次奉旨出使天竺。作为正使、朝散大夫李义表的副使,伴随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使者去天竺(此时玄奘尚未归国)。当时,他们走的是新开通的吐蕃(西藏)、泥婆罗(尼泊尔)的“车道”,这比玄奘去印度时走的路线要近。唐朝使团在泥婆罗,受到国王那陵提婆的款待。贞观十七年(公元643),泥婆罗遣使入唐,随带菠棱、酢菜、浑提葱等。其中菠棱即菠菜。据《册府元龟》记载,菠菜就是此次传入中国的。王玄策一行在天竺受到国王尸罗逸多(中译戒日王,玄奘旅居印度时,曾和他会晤)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天竺留居了近两年,曾在王舍城北耆闍崛山瞻仰佛迹,凿石为铭,又在摩诃菩提寺(大觉寺)立碑,记下使团的活动情况和观感。归国时带回了尸罗逸多馈赠给大唐的火珠、郁金和菩提树等。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王玄策以右卫率府长史衔作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仍取西

藏、尼泊尔“车道”,再次至中天竺。但是,由于国王尸罗逸多驾崩,其国发生内乱,叛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阻止王玄策一行入境。王玄策遂只身奔吐蕃(西藏),召吐蕃兵一千二,并泥婆罗骑兵七千西进,旋破中天竺的国都曲女城,生俘阿罗那顺,归长安,献于唐太宗阙下,唐太宗即拜王玄策为朝散大夫。在这次出使中,王玄策还亲手将玄奘主译的老子《道德经》梵译本(大概是第一部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典籍的外文译本,已散佚),交给了东印度迦摩缕波国(阿萨密)的童子王,加强了中印的宗教文化交流。

这里有两件事需要提及。一是这次随王玄策一行入唐的有一位印度方士,名叫那罗迦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长生不老之术。此人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后客死于长安;另一件事是,上述那位被俘的阿罗那顺,后来也客死于长安。唐太宗死后葬于昭陵,唐高宗遵太宗遗诏令设置少数民族及外国宾王石刻像,阿罗那顺也与突厥颉利可汗、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等共十四尊石像,并列于昭陵司马北门之内。

唐高宗显庆二年至龙朔元年(公元657—公元661),王玄策奉诏第三次取道西藏、尼泊尔“车道”出使中天竺,目的是奉送佛袈裟到摩诃菩提寺。抵达后,在该寺建立了第二碑记。回国时,印度高僧伽跋摩随使团来唐。另外,在经迦毕诚国时取得佛顶骨舍利一片,带回长安,供奉于宫中。归国后,王玄策又根据摩诃菩提寺弥勒图像,亲自督工在长安敬爱寺建弥勒塑像一尊。

王玄策三次出使南亚天竺等国,大大宣扬了唐帝国的国威,对7世纪中叶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文化、宗教交流,建立了特殊的功勋。曾撰《中天竺国行记》。



## 记述古城辉煌 传承中华文化

——《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序言

◎ 张岂之

西安是一块山川壮美、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之地。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这里曾经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和重要人物活动的舞台，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果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西安可以说就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之一；如果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比喻为一条大河，而西安就是这条大河的重要源头。这里有中国人引为自豪和珍贵的记忆；这里浓缩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代表了中国古代最辉煌时期的文化；这里有无数的史书典籍、出土文物和古迹遗址在诉说着她的辉煌与沧桑。

西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齐名，有着 31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1100 多年的建都史。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 13 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美誉。西安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著名的“丝绸之路”以西安为起点，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其享有“天然历史博物馆”之誉。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价值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198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西安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西安也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西安历史上又称为“长安”、“西京”、“西都”等，也曾名之为丰京、镐京、常安、京兆、大兴、永兴、奉元等，其中以“长安”最为常见和著名，蕴含着“长治久安”之意。

西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以世代传承的雍容儒雅，满腹经纶，博学智慧，大气恢弘，成为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文化的名片和中国精神的芯片。

汉唐时期，西安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最早超过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纷至沓来，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西有罗马，东有长安”是其在世界历史地位中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的西安向世界展现了文明中国拥有的自信、开放、大气、包容、向上的民族精神，铸造

了炎黄子孙永远为之自豪的文化高地。“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展示了雄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西安城墙,以及中国最大的石质书库——西安碑林,都向全世界展示着这座城历史文化的悠久与厚重。

古代的西安是辉煌的,近现代的西安也是值得骄傲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安是全国最早响应的省会城市之一。1928年,西安首次设市,1948年由省辖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辖市。1936年12月12日,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后,设在这里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延安革命根据地输送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军需物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都在这里领导过革命斗争。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以后,西安曾是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1954年改为省辖市;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计划单列市;1992年被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1994年被批准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经过6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西安已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城市服务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及辐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科技、教育、旅游、商贸中心。

未来的西安前景更加美好。她将会是国家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区域性商贸物流会展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以及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届时,西安将在国家区域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战略角色。

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是古都西安闻名

世界、充满魅力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西安赢得可持续发展的雄厚基础和重要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早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领导干部读点历史,有助于提高文化素养和思想政治修养,有助于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作为一个“西安人”不可不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因为这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作为西安市的机关干部来讲,了解西安的历史文化,热爱西安历史文化,进而引领全市人民建设未来的西安是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所以,西安市的机关干部既是西安历史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西安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要完成好如此神圣的历史使命,务必使广大机关干部认真学习、深刻理解西安的历史文化,要通过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进一步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城市风貌和历史遗存,使西安成为展示华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专家编写了这本《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编好一本这样的书是很不容易的。《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统一,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简明晓畅、可读性强,很适合广大机关干部阅读。我认为,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普及西安历史文化知识的书籍。

(作者系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



# 让历史文化记忆烛照未来

——评《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

◎ 刘 宁

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历史；一座城有一座城的文化记忆。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像西安这样拥有丰赡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对西安的厚重、辉煌的历史文化予以简明记述，是近年来内容和形式结合较好的西安历史文化方面的普及读物。并且该书匠心独运，将读者群设定为西安市广大机关干部，对这一群体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的教育普及，高屋建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西安市各级机关干部是西安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同时更是西安新文化的引领者，他们肩负着西安城市的规划和决策工作，拥有和西安市民一起保护、完善、创建西安城市文化的神圣职责。可以肯定地说，在西安市的建设和发展中，机关干部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西安建设具有历

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仍将是推动西安城市建设和文化繁荣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此意义上，编纂《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对于西安的发展和建设，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情。

历史上，由于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三代王朝的累积，在西安奠定了中国最初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和物质文明，故此，在很大程度上，西安的历史文化即为中华民族大半部历史文化的浓缩。对于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如何进行清晰而又生动地阐述，这对任何一位编撰、书写西安历史文化的学人来讲都是极富于挑战的工作。如今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读本精心设计了七章内容：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都十三朝、雄伟壮观的古代帝陵、不朽的古代建筑、辉煌的历史文化、活跃的宗教文化、原创性的制度文化。每

章基本上采用的是历时性的描述，而在整部著作中采取的却是横向、分列式的布局，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纵横交错的书写格局，建构了恢宏阔大的精神气度。从原始蓝田猿人与半坡人的繁衍生息的描述，到有文字记载的周秦汉唐鼎盛时期创建的人类文化遗产概览来看，编撰者是在一个深邃的历史隧道里，将远古石器文明与中华民族最强劲时代的文化进行比照。随后，按照从物质文化层面到精神文化层面的顺序浓彩重墨逐一涂抹，精心选取了遍布关中平原的帝王陵寝，城内与郊外星罗棋布的寺院道观，以及古道桥梁遗址，碑刻书院等物质载体，将西安的文化遗存在一个累层多元的框架中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我们流连那些屹然矗立在三秦大地的名胜古迹、建筑废墟之际，也目睹了西周的丰镐二京，秦都咸阳，汉代长安斗城，隋代大兴城，唐时的城坊制度，于是，眼前仿佛卷舒着一幅鲜活而灵动的西安城市文明图景和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我们可以感悟西安历代都市的布局、建筑设计的理念和历史流变。

平心而论，讲述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庄严肃穆的学术腔，可喜的是这部读本却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兼容了通俗、趣味性，也因此将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编者非常重视以具体的物质文化遗存来钩沉历史，这种化繁为简的叙述方式在“活跃的宗教文化”部分表现最为突出，从而避免了宗教信仰部分流于抽象论说的弊端。毋庸置疑，一座寺院就是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一座寺院就隐藏着无数名僧和高士的动人故事。跟随编撰者的脚步，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大

慈恩寺、香积寺、草堂寺、华严寺、净业寺、大兴善寺、青龙寺分别是法相唯识宗、净土宗、三论宗、华严宗、律宗、密宗、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祖庭。于是，免不了在楼观台瞻仰老子讲经处，在八仙庵的香火中体验道教文化，在重阳宫里追寻王重阳的足迹，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情形，在清真寺里领悟伊斯兰教在西安传教的盛况。不言而喻，在体味西安林林总总的宗教文化之际，《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更加彰显了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都的多元文化交杂并存、兼具包容的城市个性和魅力。

与绝大多数著作论述西安历史文化聚焦在周秦汉唐的鼎盛时期不同，读本还将笔触延伸至宋元明清及至民国时期。显然，西安的历史既可以被写成一部国都史，也可以被写成一部地方史。在近现代的视野观照下，化觉巷、关中书院，以及高桂滋公馆、止园、西京招待所，这些清末民国时期遗留下的名人故居、现代化的公共空间，不仅代表着西安近世以来的政治历史风云变幻，而且象征着中西文化合璧，标示着西安现代化发展的航向。

在我们看来，烛照历史并不是为了一味沉浸在过去，“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囿囿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而这正是西安地方志办公室倾心编纂这部《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最根本的宗旨和最高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 王永莉

作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古代都城，西安向来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闻名世界，这既是每个西安人为之骄傲的国际名片，也是西安赢得可持续发展的雄厚基础和重要资源。

西安市各级党政干部作为引领全市人民建设美好西安的先锋战士，义不容辞地肩负着传承西安历史文化与缔造西安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因此，认真学习、深刻理解西安的历史文化，就必须进行专业的历史文化知识学习，了解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城市风貌与历史遗存，在将西安打造为展示华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此，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这本《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内容涉及西安附近的中华文明遗址与古老传说、西安的都城史、西安周围的帝王陵墓、西安的古代建筑、历史文化、宗教、制度文化等七大方面，全面再现了西安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

作为一本以弘扬西安悠久历史与文化底蕴为主旨的干部读本，该书主要有三大特色：

## 一、全景式展现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到周秦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丝绸之路”起点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长达 3100 多年的建城史和 1100 多年的建都史，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底蕴堪称无与伦比。

该书以历史发展顺序为经，以西安历史文化的不同层面为纬，追溯了西安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从蓝田人到华胥氏，从伏羲、女娲到半坡、姜寨、杨官寨，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西安形象充实而饱满。自周人定都丰、镐二京开始，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先后定都于此。西周有“成康之治”，秦有千古一帝，“车同轨，书同文”，开创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汉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唐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张骞凿空西域开启丝绸之路，拉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伟大序幕，从此，丝绸、茶叶东去，异域文化徐来，西安的辉煌让世界瞩目。文周武秦，汉风唐韵，十三朝古都的辉煌灿烂，附丽于无数美轮美奂的宫殿、苑囿、建筑之上，长乐未央、兴庆大明、大、小雁塔，钟鼓楼明城墙，都是西安城不可或缺的形象代言。“秦中自古帝王州”，周、秦、汉、唐等历代帝王在选择将西安作为都城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这里作为他们的长眠之所，秦东陵、始皇陵，汉唐诸帝陵、明十三藩王陵，西安可能是拥有古代帝陵最多的古城之一。老子作《道德经》于楼观台，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及至孔孟先贤仰周礼之儒风以效之，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渐次融合，佛教思想亦逐渐本土化，其中六大宗派的祖庭均在西安，儒、释、道作为传统中华文明的精髓内核，深



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分封制、郡县制、三公九卿、三省六部、察举制、科举制等,均在本书的视野之中。称之为全景式展现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底蕴,绝不为过。

## 二、专业性揭示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传统

关于西安的历史文化传统,可能每个西安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点,但是,如果全面系统地论述,诸如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周、秦、汉、唐以外的九个朝代都有哪些?秦都咸阳、汉长安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设计理念、形状与布局如何?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安城又是怎样变迁?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又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雄伟壮观的秦汉唐诸帝陵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恐怕就非专业研究人员所不能及了。

本书对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都学、文化学、人类学与历史地理学诸多研究领域,以高屋建瓴的专业研究视野,选取了西安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并将其分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都十三朝、古代帝陵、古代建筑、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制度文化等七大专题,对西安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发祥作用、社会影响与典型文化形式等进行深入剖析,从蓝田人头骨到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的彩陶、刻画符号以及祭祀场所、杨官寨遗址的城市聚落;从秦都栎阳到秦都咸阳的城址变化,从秦都咸阳到汉唐长安城的形状、布局与设计理念;从汉唐诸帝陵的建造到陵邑制度的发展变迁;从秦直道、驰道、秦汉桥梁到唐大、小雁塔、西安城墙的修建与历史功用等,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从丝绸之路到碑林、关中书院,从汉赋到唐诗等,不仅客观描述了古今西安的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物,而且

在对史籍文献的专业解读的基础上复原了西安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与前世今生,宏观而不失具体,专业而不失趣味。

## 三、通俗地描述古城西安的历史文化内涵

大凡涉及历史文化类著述,往往不外乎两种写作风格,或重史籍文献,志在理论建树或解读考证,常流于枯燥艰涩;或重故事叙述,志在普及常识性知识,甚至于捕风捉影,妄加演义,故多有肤浅之嫌。

《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以传承弘扬西安历史文化为主旨,目的是为了西安市各级党政干部更好地了解西安历史文化,因此,本书的编撰者采用了易于为读者接受的写作手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历史发展过程,将重大的历史事件融入到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当中,有效地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同时也更好地保留了学术性与专业性,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更进一步了解西安历史文化。为了更直观地再现西安历史文化,本书还配置了大量诸如蓝田人的头骨化石、半坡遗址中的尖底瓮与人面鱼纹盆、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俑和铜车马、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图、隋大运河示意图、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关中书院等插图,这些图片穿插在相关文字当中,与文字内容互为说明,相互佐证,图文并茂,形式生动活泼,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通俗性与可读性。

总而言之,《西安历史文化干部读本》立足于广大机关干部学习西安历史文化的基本需求,融专业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全景式地勾勒了一幅西安历史文化的历史场景,内涵丰富,语言通俗,形式生动,读之如沐春风,很适合广大机关干部普及西安历史文化知识之用。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博士)

# 辛亥革命的先烈

## ——王绍文



王绍文，名鸿遇，以字绍文行世，1890年生于陕西西安城内一位富商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毕业于陕西高等学堂。

少年时代的王绍文身体弱小，“貌清癯如处女”，“性沉默，特立独行”，视古代游侠为榜样，急公好义，“遇人急难，辄倾囊相周”，从不吝啬。对传统教育中的“章句”之学不屑一顾，崇拜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因其多谋善断，同学都以其与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张良（子房）相比，誉王绍文为“小子房”。读书时，常与志同道合者“侃侃谈天下事，每论及社会主义及其结果，预推未来世界之进化”。从中可以看出，王绍文不仅关心天下大事，对社会主义也有粗浅的了解，且胸怀救国救民之志。

王绍文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清政府走向没落的时期，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成立同盟会，组织反清运动。受孙中山的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陕籍学生井勿幕等人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春，井勿幕在陕西三原县成立陕西同盟会，发展革命力量。年仅十七八岁的王

绍文加入同盟会，成为陕西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也是最年少的同盟会会员（《王烈士绍文墓表》）。加入同盟会之后，王绍文主要做同盟会的会务工作，不仅积极参加同盟会在陕西的革命活动，而且变卖家中的房产、土地为陕西同盟会筹集活动经费。王绍文做人十分低调，陕西独立后，革命党人中“人人自诩革命功，烈士（指王绍文）独不言，亦无知者”。许多人宣扬自己在革命中的功劳，唯独王绍文不说自己为革命做过什么，故他所做过的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随之陕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陕西支部，王绍文担任文事科干事。因活动经费困难，“党员多散”，独撑局面，“任怨任劳”。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镇压革命党人的活动，陕西革命受到很大影响。在此情形下，王绍文组织敢死队多人，与同盟会会员吴希真“草盟文，订约章，立机关曰平民会，分科任事，吾秦革命事乃稍稍萌茁矣”。王绍文等革命党人以平民会为秘密据点，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13

## ●人物春秋●

年7月，国民党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江苏、江西等省宣布独立。陕西革命党人密谋响应，但王绍文认为时机不成熟，应先派人与南方独立省份联络，再做决断。他说：“赣宁起义，道梗消息鲜通。微论功不必成，即成矣，而鞭长莫及，谁为应援，此坐困之道也。为今之计，当先令人赴南省联合，且默察其真相，及敌军强弱，然后徐图响应”。陕西革命党人接受了他的建议，派吴希真到南方观察形势，并试图与独立省份取得联系，但当吴氏到达上海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从这件事情来看，王绍文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革命者，他站在战略高度思考“二次革命”期间的陕西革命问题，不愧有“小子房”之称。“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大肆镇压革命党人，王绍文等陕西革命党人创办的平民共济会被查封。一时“谣言四起，人人自危”，有的人离开陕境，也有人劝王绍文离开，他说“此心无愧足矣，走将焉往？卒弗动”。始终坚守西安，继续为革命奔走。

1914年，河南白朗农民军进入陕西，革命党人吴青纯等人趁机在白水县举义，失败后吴青纯被囚禁。王绍文虽与吴氏素昧平生，但却冒着生命危险为其赠送金钱。对于此事，后人评价说：“烈士（指王绍文）与青纯弗素相知，竟能见义勇为，岂非笃厚君子欤！”袁世凯以镇压白朗为由，派陆建章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取代张凤翔，开始了北洋政府在陕西的统治。为了做长期反袁斗争准备，1915年春，王绍文变卖家产，在西安创办了三育高等学校，“培植后起人才”。足见其为革命深谋远虑。

随着袁世凯称帝步伐越来越急迫，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在此背景下，王绍文、李岐山、杜守信、张子宜、张深如等在西

安的老同盟会员为配合省内外的革命活动，决定“讨袁（世凯）逐陆（建章）”，开展秘密活动，以莲池体育场（今西安莲湖公园）为聚会地点，以兴平会馆（在今大麦市街）为联络机关，以精业公司（在今东大街）为传达消息处。并决定于1916年的农历除夕夜（2月2日）起义，之后分头派人联络陆建章的警卫队、镖局张怀芳、南校场驻军以及洪帮弟兄等，为举义的骨干力量。起义发动的步骤是先在兴平、咸阳、礼泉暴动，然后由西安响应。王绍文、李岐山、张深如等人留在西安城外，其余人员分别赴兴平、咸阳、礼泉3县活动。不料因筹划不密，加之镖局张怀芳被陆建章副官所收买，和盘托出起义计划。陆建章在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西安的王绍文、张子宜等人被捕后，杜守信等陆续被捕。

革命党人被关押在西安陆军监狱，遭受到严刑拷打。1916年2月15日，王绍文、杜守信等17人被陆建章杀害于西安老北门外的西火巷。在押往刑场的路上，路旁观者如潮，有的大骂袁世凯，有的大骂陆建章。王绍文则“仰天太息曰：吾今日后乃得出苦海矣。顾谁复拯吾民出水火者，我死矣，愿吾同志勿忘斯言，则吾虽死犹生。”行刑时刽子手让王绍文跪下，他大骂：“老子为国为民，给谁下跪！”最终直立不屈，大义凛然，被害时年仅26岁。与王绍文同时被杀害的有17人，加上在陕北被杀害的张深如共计18人，称之为反袁“十八烈士”。

辛亥革命中，多少仁人志士为建立民主共和，抛头颅、洒热血。但一些人英名长存，一些人埋骨黄土永为尘埃。近日读《王烈士传》《王烈士绍文墓表》《十八烈士遇难记》等文献，王绍文事迹感人至深，当尊为楷模。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党的八大到九大的13年间,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

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 ●史料钩沉●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3 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 · 名句欣赏 ·

**【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春秋穀梁传·隐公元年》

贵:崇尚,重视。惠:私惠。邪:邪说。

**【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左传·昭公元年》

毙:灭亡。

**【不义不昵,厚将崩】**——《左传·隐公元年》

昵:亲近。厚:实力雄厚。意谓没有正义便不能使民亲近,实力雄厚反而会崩溃。

**【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

从:顺从。



## 毛泽东一生中 决策的最后一仗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决策、指挥了我军在西沙海域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更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1970年代初，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据统计，至1973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

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南越当局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再次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渔船进行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

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1974年1月，由周恩来和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放在毛泽东的案头。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报告提出应通过加强巡逻及其他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毛泽东在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指出：“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工事构筑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 ●史料钩沉●

17日20时,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的军事五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重大事宜及紧急作战事项。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也迅速做出相应决定。

为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月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五人小组(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

1月19日清早,南越海军派出3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编队的4艘舰艇,总吨位加起来还不如敌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火炮也比敌方弱。

南越“李常杰”号驶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放下4只橡皮艇,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首

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奋起自卫还击,当场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被迫撤退,狼狈地逃回舰上。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4艘南越军舰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经过一场恶战,南越“怒涛”号被我海军击沉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报经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月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部署。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

陆部队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仅用4个小时（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顺利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三岛。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自卫反击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击伤南越驱逐舰3艘，击沉护卫舰1艘，毙伤南越官兵100余人，俘敌48人。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

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全民族凝聚力。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决策、指挥的这场西沙保卫战，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解放军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

西沙海战结束后，中国东海舰队第一次直穿台湾海峡增援前线，台湾方面不予阻拦。1988年的海战，祖国大陆舰队在台湾驻守的太平岛停留并补给。海峡两岸在维护南海主权问题上，可以说都是以民族大义为先，步调一致。

## ·解字·

“史”



①



②



③



④

“史”字本来也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①的上部的“中”字形，原来也是指捉禽兽的长柄网，下部是一只右手。金文②与甲骨文的形体相类似。③是小篆的形体，是由甲金文字直接演变而来的，形体大同小异。

④是楷书的形体，写法较小篆方便得多。

“史”字的本义是指管理狩猎或记录猎获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史官”，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良史也。”也就是说：这个人古代的好史官。从“史官”又引申为记载历史的书称为“史”，如《史通·叙事》：“史之烦芜。”其意思是：历史是很繁杂的。

古书中常有“史乘”一词，这个“史乘”最初是指晋国的一部史书，也叫《乘》。后来称一般的史书就叫“史乘”。请注意：“史乘”中的“乘”字若读为 cheng(秤)那就错了，这里必须读为 sheng(胜)。





## 张学良 西安事变前后心迹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学良曾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发表了内部讲话。他在讲话中推心置腹，痛陈利害，表白了自己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推动抗日救亡的决心。

张学良的讲话稿刊登在东北军参谋部于1936年12月编辑发行的杂志《东望》(第6卷第6期)上,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编撰的馆藏资料《西安事变史料》中。

讲稿题为《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并在引言中说明这是1938年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的讲话。全文竖排,约3000字。

张学良从讲话的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煎熬：“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

万分难过!”

关于前一天发生的事件,张学良说:“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他提出自己曾想过三个办法:第一,和蒋介石告别,自己辞去职务走开;第二,对蒋介石用口头做最后的净谏;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

“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什么,我一点不在乎。”“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张学良这样说。

由于前两种办法行不通,再加上沈钧儒等七位救国领袖被捕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两个近因,他“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他同时向各位干部职员表示,蒋介石极为安全,他们对蒋没有私仇私怨,只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

对于发动西安事变可能造成的后果,张学良表示:“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

他在讲话中激励东北军将士:“这次事件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 “节俭”的道光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富有四海”，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么，道光帝的节俭为何没有为他留下美名，却被人取笑为抠门、吝啬呢？作为一国之君，他究竟能俭朴到什么程度？道光帝这种过度的节俭，是天性使然还是别有用意呢？

道光帝的节俭，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九月，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沈阳故宫里，虽说是宫廷，但实际上相当局促简陋，不要说无法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晋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沈阳故宫阔气多少倍。

嘉庆皇帝特意把道光领到了清宁宫东暖阁，又叫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已经没人会用的糠灯、牛皮制成的蠢笨的乌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着这些简陋的物品，听着父皇的讲解，回想着祖先创业的艰难，立志要节俭律己。

回京后，道光与妻子一说，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此后，每日下午四点前后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来回路远，太监怀里揣着烧饼，一路小跑，烧饼仍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毫无怨言，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连灯都不用点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

道光元年，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表达了节俭的理想：

第一，重义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给你们省。

第二，停止各省进贡。道光认为各省进贡的多是些土特产，比如水果、蔬菜、茶叶、药材等，地方官每每谄媚地说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钱。但一点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儿，百姓就少一点儿负担。而且，不远千里，送到北京，运费太贵，浪费更大。譬如盛京，每年进贡辽阳产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钱，但要雇 50 个壮劳力挑到北京，一来一往一个月，挑到北京烂掉一半，浪费之大，可想而知。

## ●史料钩沉●

第三,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经过康雍乾几代经营,皇室居所已经尽善尽美,除了日常维护外,不必再修。今后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讨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这个主意,花言巧语,蛊惑圣听,就是大清万世的罪人,将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一片颂扬之声。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

这不,眼前就有一个难题,道光帝说停止进贡,但各省官员谁也拿不准能不能当真,何况进贡本身对地方官来说也是有利可图。于是,心照不宣,宁左勿右,照常进贡。当然,进贡不叫进贡,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辞再恳切些,不怕他不收。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但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笋、云南的药材、浙江的茶叶、扬州的玉器、景德镇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为难了,处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员?古语说得好,伸手不打送礼的,而且法不责众;如果将这些孝敬退回各省,运费就会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岂不是出尔反尔。

送孝敬品的官员不厌其烦地劝说皇上,这些东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内务府也得到市场上去买。不成想,一提内务府,却立竿见影,道光帝马上下令“赏收”(皇帝给别人东西叫赏赐,收别人的东西叫赏收)。各省的差官欢天喜地,忙不迭地叩头谢恩。

为什么一提内务府就立竿见影呢?

内务府是一个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内务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当时官员盘剥百姓,上级官员盘剥下级官员,内务府官员盘剥的对象就是皇上。大家肯定会感到奇怪,内务府连皇上也敢克扣、盘剥?当然敢克扣,内务府主持皇室家务,事涉宫闱,国家监察体制对其不予监管,由皇帝直接监管内务府。

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内务府,原因有三:

一、离开了内务府,庞大的皇室就玩不转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迁就些;

二、以主子之尊,与奴才们斤斤计较,开不了口。因为这种举动有失身份,而且这种社会经验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计不过内务府;

三、内务府大臣都是皇帝较为亲近贴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应了那句话: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内务府就是个“灯下黑”的地方。

内务府官员克扣、盘剥皇帝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工程回扣,二是为皇家购物时报花费,无论买什么东西,一经内务府的手,顿时价码倍增。

道光皇帝厉行节俭,内务府阳奉阴违,所以,一提起内务府就头疼。收下了各省送来的“孝敬”,道光帝感觉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折中办理,删改则例,减少贡品数量、种类,如属于奢侈性享受的贡品就彻底禁止孝敬,其他贡献的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减少,并强调按此落实,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减。比如,规定辽阳的香水梨以后每年进二百个。盛京官员跟皇上说:皇家那么多人口,这二百个梨哪里够吃?道光帝说:不吃,留着上供用,二百个足够了!

因为削减了贡品,而道光帝又将宫廷每年经费降到二十万两。事实上,偌大一个宫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万两才能支应得开,于是

宫廷生活艰难起来。

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满清外史》记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

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道光帝对皇后的贤惠十分满意，逢皇后生日，决定为皇后祝寿。满朝亲贵重臣献上寿礼，拜完寿，自然留下赴宴。众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御宴将是何等排场，不料开宴才见一人一碗打卤面。后来听说，为此次寿筵，道光帝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而皇后更是高兴，因为道光帝曾明确规定：万寿节（皇帝生日）、皇后千秋节（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节）、冬至的庆贺礼仪筵宴停止举行，这回算是破了例了。

### ·解字·

# “右”



①



②



③



④

“右”字本为象形字。甲骨文①就像一只右手之形，所以在上古“又”字就是右手。②是金文的形体，在“又”字之下，又增加了“口”字，变成了一个专当“右手”讲的“右”字了。③是小篆的形体，是由金文直接演变而来。④是楷书的形体，把其中的一大撇的方向改到左边了。

“右”字本为“又”，是个右手之形。后因“又”字被用为“再、更”之义了，所以就在“又”下增加了一个“口”字，表示“赞助”之义，如：“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左传·襄公十年》）也就是说：天子所赞助的，我也赞助之。后又因“右”字被用为“左右”之“右”，那么当“保佑”、“赞助”或“照顾”讲的“右”就只好在其左增加了个单人旁，新产生了一个左形右声的新形声字“佑”来加以区别。这样一来，“右”与“佑”就有了明确的分工。在古代是以右为上的，如“右姓”就是指世家大族；“右职”是指重要的职位；“右戚”是指与帝王亲近的亲戚；“右族”是指古代有声望的大族。

请注意：古代的东方和西方，往往用左方和右方代之，如钟会《檄蜀文》：“姜伯约屡出陇右。”所谓“陇右”就是“陇西”，这与我们现在地图上标的方向正相反。现在看地图应该是右东左西。

## 陕西书院简述

◎ 史飞翔

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原为宫廷修书、藏书之所。开元中建于朝省。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五年(717)乾元殿写四部,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学士,掌刊辑在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所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唐开元六年(718),陕西即在今蒲城和西安设立了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725)改为集贤殿书院。唐代蓝田学士李元通曾在县治南建瀛州书院。另外,唐代还有两所陕西人在外地建造的书院:一是三原人李靖建在青州府临朐县的孝公书院,一是永州太守长安人韦宙建在湖南衡山县的韦宙书院。

宋代中央政府曾命令地方大办书院,书院逐渐成为理学家或其他学者的讲学之所,其目的在于自由研究学问、修养身心,这时陕西私人设立的书院较多。关学宗师张载,熙宁初曾于长安、武功等地讲学。熙宁三年(1070),回眉县创立横渠书院,是为陕西实际意义上的书院之肇始。除横渠书院外,宋代陕西临潼有白鹿书院。另外,范仲淹曾在延安城东南建嘉岭书院。

元代陕西书院亦盛。在元代13个一级行政区中,陕西是有书院分布的七个行省之一。建有三原学古书院、岐山岐阳书院、临潼居善书院、高陵渭上书院等八所。其中最著名者为鲁斋书院和学古书院。

明初,陕西书院不甚发达。明弘治八年(1495),王恕之子王承裕因病归里,假三原县北城永清坊普照寺废院建“弘道书院”,此书院为陕西明代最著名的书院之一。翌年,经巡

按御史李瀚时、提学副使杨一清提议,武功知县宋学通于武功县城以宋人张载讲学之“绿野亭”建“绿野书院”。万历八年(1580),三水县(今旬邑县)人、吏部主事文在中挂冠归里,在其家所在的半川府(今太村镇文家村)创设“乐育书院”,日讲内圣外王之学,学子负笈从游者甚众。嘉靖前后,陕西书院的发展超过前代,共有书院48所,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万历年间(1573—1620),醴泉人郭玉柱于县城西北隅建“星聚书院”,明末时尚存。有明一代,武功县还于邑人、工部尚书康汝楫读书处建“东里书院”(因在县西原之东),以纳学子。明代后期,陕西境内影响最大的书院当推关中书院,为明代陕西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冯从吾创建。从游者“几千余人”,地方狭小不能容纳,不得不于寺东南小悉园改建。成为西北一个讲学议政和培养士子的文教中心。明泰昌元年(1620),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元天启,朝政更加败坏。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权倾朝野。天启五年(1625)八月,陕西的宦官党羽迎合魏忠贤阉党禁毁天下书院旨意,捣毁了关中书院,并把书院里“斯道中天阁”中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去“掷之城隅”。

清初,为压制舆论期间,对书院也采取抑制政策。诏令改书院为义学,并“不许别创书院”。当时硬性规定各省会设书院一所,其经费由政府拨给,书院山长由各省督抚学政聘请,学生由各省道员和布政司会同考核。私人欲办书院须报官府核查,书院实际上变成了官学。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才命各省城设立书院,并拨付开办经费。“乾隆十年(1745),礼部议准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清代陕西共设有书院171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渭南五凤书院、景贤书院,凤翔书院,陇县五峰书院,岚皋烛峰书院,府谷荣河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蓝田玉山书院,大荔丰登书院,宁陕太乙书院,蒲城崇礼书院,兴平槐里书院,华县少华书院等。这些书院到了清末的时候,大多发展成为近代学堂。

(作者供职于西安翻译学院陕西终南学社,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 西安城门趣闻(五)——文昌门

(西安城南面偏东门之一,位于柏树林街南口)

### 1.文昌门的得名

西安城文昌门开辟于1986年,因门内旧有文昌庙而得名。

文昌门内西偏,明清时设有西安府学、长安县学与咸宁县学,而在此学宫的东侧正对今文昌门处,建有一座文昌庙。

文昌庙,亦称文昌宫,为奉祀文昌星与文昌帝君的祠庙。文昌星又名文曲星、文星,神话传说为主持文运与功名利禄的星宿。自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将晋张亚子“梓潼帝君”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后,遂与文昌星两者合祀,并建庙于学宫附近,以祈学子文星高照,文运大兴,科考折桂,博得功名。

### 2.文昌门外唐高等学府

文昌门外西侧昔唐务本坊的西半部,设有唐朝中央主管教育的机关国子监,及其所领的中央最高学府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及高等专科学校律学、书学、算学等七学的所在地。

国子监置长官祭酒一人,副官司业二人,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及律学、书学、算学,主要招收官僚子弟入学。每年生徒中毕业生,经祭酒、司业考试合格,推荐给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

国子学为唐代最高学府,主要招收三品收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三百人入学。学生按《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

## ●西安风情●

《礼记》五经分业,各 60 人。暇则习隶书、《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每年生徒中有学通两经、请求做官者,经国子监考试合格后送尚书省,再经吏部(后改礼部)考试任官。

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学习亦如国子学,以五经分业,每经百人,共五百人。唐代外国留学生,多在太学中学习深造。《唐语林》:“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四门馆主要招收一般七品以上子弟及有才能的平民子弟入学,传授儒家经典,教法如太学。有学生 500 人。

广文馆专门培养国子学中攻进士科者,有学生 60 人。当时曾以郑虔为广文馆博士,故人呼郑虔为郑广文。

律学是培养司法人才的学校,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法例,有学生二十人;书学是培养书法人才的学校,主修《石经》《说文》《字林》;算学是培养天文学和数学人才的学校,以《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周髀》《五经算》《缀术》等分专业。

### 3.文昌门外吉备真备纪念碑

在文昌门外西侧环城公园入口处,即原唐长安务本坊太学附近,竖有日本人吉备真备纪念碑。吉备真备为日本遣唐留学生,日本奈良时代政治家、学者。开元五年(717年),23 岁的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一起,随遣唐使团入唐学习。在长安太学从师赵玄默十七年,勤奋好学,深通经史。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国,带回中国典籍《唐礼》《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乐书要录》《东观汉记》及乐器、兵器、工具、围棋等物品,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天宝十一载(752年),吉

备真备又以“副使”身份,随第十次遣唐使入唐,受到唐玄宗的特殊礼遇和高度评价。次年归,官至右大臣。曾利用汉字楷体造日字片假名,参与修定《养老律令》。著有《私教类聚》五十卷。为纪念这位中日文化友好使者,在他留学长安务本坊太学附近的文昌门外西侧环城公园处,竖有吉备真备纪念碑。

### 4.文昌门外唐褚遂良宅

褚遂良(596-658 或 597-659),唐大臣,书法家。字善登。唐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文史,尤工隶楷。贞观中,官至中书令,封河南邵公。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居宅在长安平康坊西门之南,旧址约在今文昌门外文艺路北段路东。

### 5.文昌门内文庙

文庙为祭祀孔子的祠庙。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因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以后称文庙,相对武庙(关羽庙)而言。西安文庙位于府城南门内之东,建于宋,元至元中廉希宪重修。明正统(1436—1449)年间西安知府孔仁益增拓之。文庙坐北向南,大门为棂星门,门前为泮池,跨以石桥。入内有正殿七间,两庑各十七间。庙址在今三学街东段路北西安碑林博物馆左前侧。

### 6.文昌门内碑林

文昌门内东侧,为闻名全国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是目前国内集中收藏古代碑刻数量最多、历史最久的一处碑林。

西安碑林形成于唐末至北宋三次迁置唐《开成石经》的过程中。唐《开成石经》始刊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成于开成二年(837年),共一百一十四块石,刻《周易》《尚书》《诗

经》《周礼》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共 65 万余字，原藏于务本坊太学。唐末天祐元年（904 年），韩建放弃官城与外郭城，而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原外郭城务本坊太学被隔在新城之外，石经委弃于野。五代后梁时，韩建与长安守将刘郡将石经收集藏于府城内原唐“尚书省之西隅”，旧址约在今西大街北广济街东侧，这是唐末以后第一次迁置石经。

北宋元丰三年（1080 年），知永兴军府事吕大防迁建文庙、府学于“府城之坤维”，即西安城西南隅。元稿二年（1087 年），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将唐石经及诸多唐宋碑刻也由“尚书省之西隅”迁往府城西南隅，置于“府学之北墉”，这是第二次迁置唐石经。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 年），京兆知府虞策又将文庙、府学及唐石经等碑刻，一并迁建于“府城之东南隅”，即三学街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址。

碑林形成后，历代均有整修收藏，初称“碑院”，自明代万历年间始称“碑林”。现藏自汉各代碑石、墓志一千六百余种、二千五百余石。共有七座碑室、七座碑廊、八座碑亭及石刻艺术室等四座文物陈列室，占地 319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984 平方米。西安碑林堪称是一座儒家经典的石质图书馆和内容丰富的史料档案库，是中国文字发展史的直观展示和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和石雕刻艺术的宝库。

### 7.文昌门内卧龙寺

文昌门内东侧，有一座著名古刹卧龙寺。该寺相传创建于东汉灵帝时，隋名福应禅院。唐代因名画家吴道子为该寺绘有观音像，故又名观音寺。该寺原建何处及何时迁建今址均不详。宋初名龙泉院，宋太宗时高僧惟果为

该寺住持，终日常卧，人称卧龙和尚，因而定名为卧龙寺。明正德十六年（1521 年）秦王藩府重修。清同治五年（1866 年）因东南邻近的火药局爆炸，寺内殿庑多被震毁。七年（1868 年），邑人募资重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慈禧逃亡西安期间，曾赐该寺“慈云慧日”匾额，光绪帝赐“三毒拊耀”匾额，并赐银千两予以修缮。寺占地 6000 平方米，坐北向南。次有山门五间、金刚殿三间、大雄宝殿五间、法堂三间。中院两侧为东西跨院，分置念佛堂、藏经楼等。寺内原帝石佛像 1 尊、唐乾宁元年（894 年）大悲心陀罗尼经幢 1 座、传为后人摹刻吴道子所绘观音画像石 1 方、佛足迹碑和梵书吨字赞碑各 1 通、北宋咸平六年（1003 年）“幽冥钟”1 口及宋磧砂版大藏经、贝叶真经及清代玉香炉等。碑刻、石像于 60 年代至 70 年代多已毁佚，仅存唐乾宁年大悲心陀罗尼经幢半截，藏经已移存别处。

### 8.文昌门内柏树林

今文昌门内北直柏树林街。此街为南北纵街，北接端履门，南至文昌门，长 431 米。自宋以后，此街南段路西临近文庙。明正统（1436—1449）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在文庙四周广植柏树，此街由此得名，今仍沿称。







沣东都市农业博览园效果图

##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原名西安沣渭新区,2010年12月6日,陕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委、市政府为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加快推进西咸一体化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将其更名为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实行“省市共管、开发建设以省为主”的体制模式,社会事务管理、干部人事管理仍然保持原有的以西安市为主的管理体制。

沣东新城地处关中渭河冲积平原,北临渭河,南靠秦岭、沣河贯穿全城,新河、沙河等多条河流水系在区内纵横交汇,新区山水田园生态独树一帜。新城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9公里,距西安北客站6公里,距西安市钟楼仅有12公里。六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快速干道等各种路网四通八达。

沣东新城将以坚持包容发展,打造新兴城市板块为主旨,以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主城功能新区和生态田园新城”为目标,依托大西安,服务大关中,面向大西北,以高新技术和会展业为主,重点发展高新技术研发和孵

化、体育、会展商务、文化旅游、现代农业、房地产开发等产业,建设“区域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和体育会展中心,大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引领区,未来将建设成为具有东方人文特色的生态化国际新城”。

面向全国,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立足陕西,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板块和引领区,成为西咸新区独具特色的人文、田园生态新城;引领西咸,建设高新技术研发孵化、会展业聚集区,成为经济区重要经济增长极。

将建设“两带、七板块”。其中的两带,一是围绕周丰镐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三大遗址,建设周秦汉历史文化景观带;二是围绕沣河综合治理、沣河生态景区和两岸环境提升建设城市休闲景观带。七大板块是指奥体文化板块、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区板块、六村堡现代产业园区板块、三桥商业街板块、国际汽车城板块、镐京立体城市板块和昆明池生态休闲板块,将打造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城市主体功能区。

# 高陵曲子

富小云 整理

曲子,又称清曲,是一种古老的以坐唱为主的民间曲艺形式,在关中又有“迷糊曲子”和“板凳戏”之称。

高陵曲子起源于清咸丰年间,隆盛于民国时期。高陵曲子的表演形式以坐唱为主,七八个演员,各执三弦、二胡、板胡、斗嗡、四页瓦、碰铃等乐器,自伴自唱,自娱自乐。老艺人大多一专多能,身怀多种技艺。

高陵曲子曲调丰富,在民间老艺人中有:“七十二大调、三十六小调”之说。以“月调、背弓调、五更调和金钱调”等四大调为最基本和最常用的。其中月调分:“硬月调、软月调、月尾调”;背弓调分:“前背弓调和后背弓调”;五更调分:“硬五更调、慢五更调和五更一串铃”;金钱调分:“大金钱、反金钱和跌落金钱调”。此外还有:“五更鸟、一点油、乐江、湘江、哭道情、放风筝、琵琶调、十里堆、司片、海调、满江”等大调也较为常用。小调曲牌有:“西京、岗调、紧诉、慢诉、长城、采花郎、一串铃、银纽丝、连相、定岗、勾调、船调、小妹子脚和闹活调”等等。

高陵曲子的曲调在演唱当中,具有极强的表达性,例如:演唱叙事类的《双官诰》或《全家福》,运用京调,就酣畅淋漓。演唱抒情



曲子武场伴奏器具

性的《五更鸟》和《阴功传》,运用五更调演唱,就会将人凄婉、哀怨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运用岗调演唱《渡林英》,能够恰如其分的展现热闹的场面和欢快的剧情。

高陵曲子既可单曲演唱,又可多曲联唱。演唱起落中间根据曲目的需要,可套唱多个曲调。但是,套曲联唱有严格的演唱套路,一般规律是:“月调起月调落”;“月调背弓起,背弓月调落”、“五更调起月尾调落”。

高陵曲子的剧目繁多,其内容异彩纷呈。有反映历史故事的,有叙述爱情故事的,但更多的则是反映农村生活题材。老艺人自编自唱的剧目有:《蚂蚱灵》《脏婆娘》和《卖柿子》。传统剧目有:《玲珑塔》《朋友曲》《出关》《刺目劝学》《小姑贤》《隔门贤》和《寡妇恋爱》等等。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高陵曲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避方言土语**,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地方特色突出。即兴而起、即景而歌、即情而寄,爱恨情仇溢于言表,既保留了民间俗曲的质朴,同时又具有自然、浪漫、狂野的情调。从结构形式上,高陵曲子可分为大曲和小曲。大曲基本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或一个大的片段。小曲一般没有故事,是某种感情的诉说,或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或表现人的悲伤情愁。高陵曲子的唱词,有整齐排列的、有长短句组合的,曲子词是随艺人意识流动而唱补的即兴之作,极具民间性。

陕西民间各地都有曲子传唱活动,分为东路、中路、西路曲子三大板块。高陵曲子属于中路曲子范畴。曲子起源较早,史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据本次普查资料得知:孙金元是已知高陵县境内传唱曲子最早的老艺人之一。孙金元清咸丰七年(1857)出生,酷爱曲子,擅长三弦弹奏,以弹唱《古城会》《五虎戏》最为出名。因其能弹能唱,装谁像谁,多才多艺,故在民间有“高陵曲子师祖”之称。在他的熏染下,曲子扎根民间。经常出现在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及民间庙会当中。继孙金元之后的另一位艺人叫周尚礼,同治三年(1864)生,现药惠管委会中王村人。平时做生意,店铺名为“同发源”。因其爱好唱曲子,故县里的曲子艺人常云集他的店铺内,谈曲论唱。周尚礼亦是能弹能唱,他演唱的《雪梅吊孝》《黑访》曾轰动县城。尤其是农历八月初二城隍庙会,正殿演出点非他莫属,没有他的参与,小曲演唱活动无法正常开展。1945年,周尚礼自编自演的《蚂蚱灵》在县境及周边地区广为传唱,为高



2007年高陵曲子在县文化馆  
新春大舞台上演出

陵曲子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另一位曲子名家叫李文贤,1914年出生,通远镇人,擅长三弦弹奏。1951年曾任教于通远民大,专职教授三弦弹奏技法。1958年曾应邀奔赴东北传授三弦弹奏技艺。1983年3月,曾协同县文化馆对高陵曲子进行了为期2个多月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出版了《民间曲子清唱》。第四位著名演唱者叫郭青海,1925年出生,张卜乡塬后村人,为高陵曲子演唱的第四代典型人物。其伴奏的四页瓦被称为一绝。四页瓦拿在他的手中,伴奏起来翻转自如,碰击铿锵有力,音色脆亮,富有极强的节奏感。他演唱的《贵妃醉酒》字正腔圆,架势稳中有奇,扮相唱腔双佳。在上述四位著名曲子演唱家的影响下,高陵曲子一路传唱至今。

高陵曲子源远流长,在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高陵曲子现有成员30余人,其主要分布在高陵县的张卜乡塬后村、姬家管委会枸杞赵村和药惠管委会中王村。

2009年5月入选西安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年6月,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在民国 当个县长有多难？

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任用，有考试和荐举两种途径。但真要当上一县之长，无论走哪条路，都不容易。

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据统计，1928—1929年两年间湖广和东南各省先后举行过一到三次县长考试，共录取1300余名，此后直到抗战结束，除了极少数省区举行过一两次外，多数

省区都没有再进行过县长考试。因此，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需要生逢其时才行。其次，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比如1928年广西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与试者数百，仅录取一名。再者，即便考上了也得不到实际的任用，比如江西省在战前先后举行县长考试四次，计录取63名，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12人。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5的人得到了实际职位。

考试只是选拔县长途径之一，更多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而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举荐县长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二到三人，然后按法律手续转请任命。这就意味着民政厅长掌握着举荐县长的权力，大权在握，难免滋生腐败。滥用职权者，任人唯亲者不乏其人，甚至有人公然买官卖官，将县长当作敛财工具。比如1929年，传闻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出卖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一等县县长6000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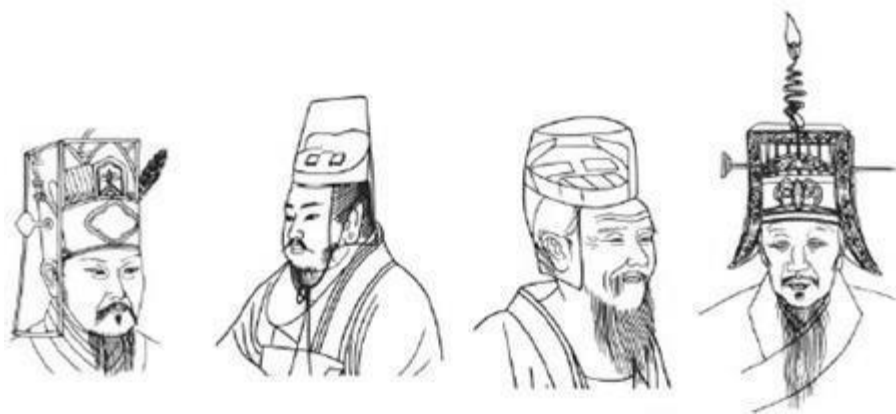
等县县长5000元；三等县县长4000元。又如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期间，在任命县长等官员时“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论价出售。”

当上县长不容易，要想把县长当安稳更困难。民国县长更迭非常频繁，以河南为例，仅1931年就更换县长226人次（当时河南共有112个县），平均每月更换县长16人次。1931年至1935年五年间，河南省总共更换县长513人次，平均每年约有103人次。其中商丘、安阳、确山等县1927—1937年换了25任县长，陕县换了30任。也就是说县长的任期普遍不满一年。县长更迭频繁，成为民国官场的一大顽症。在这种环境中，想要坐稳县长宝座，既要讨好省府官员，又得巴结当地士绅，还得伺候驻军，得罪任何一方，不但官位难保，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要想县长做得稳，非但不能得罪当地豪绅，还必须要跟这些人搞好关系。比如县长上任之后首先要拜访当地土豪大姓，以联络“感情”，寻求其对自己推行政令的支持，县政的推行若无豪绅同意，寸步难行。

再者，还得应付得来省府机关分派下来的各项苛刻任务。不仅事情多，上级管辖机构林立也让县长不胜其烦。最重要的，必须当好军队的“军需兼副官”在军阀混战时期或者战争年代，要想当好县长，伺候好军队的功夫也少不了。

民国时期曾任酒泉县县长的魏允之自称“全副精力，须以百分之三十应付土劣；百分之三十周旋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等因奉此；其余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即便如此，其施政仍旧多方受阻寸步难行，可见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



## 古代官员

### 任职回避原籍制度始于何时？

战国以前我国的官吏职位是世袭的，即所谓“世卿世禄”制，国家对于官员的任免并无太多的管理。秦汉时期对官吏的任用已经逐步形成一些严格的法规。西汉景帝时即开始实行回避制度，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在地域上逐渐增加限制。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唐宋元明时期的补充、完善，到清代时，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员回避制度达到了顶峰。

官员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大一样，总体来说可以概括这样几类：一是地理回避，即官员的籍贯与就任地区不得相同或相邻；二是亲属回避，即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后一种回避制度至今仍然存在，大家也比较熟悉，可是前一种至今仍然沿袭的范围有限。不过仔细研究之下，地区回避制度似乎对于遏制腐败、尤其是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应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三是用人回避、

科场回避、诉讼回避等其他方面的回避。

地理回避是指凡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即回避本籍。东汉时期出台“三互法”，即“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唐朝规定不许任本籍州县官及本籍邻县官。宋代，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本籍，而且非本籍但有地产的亦须回避。北宋时正式规定任职须回避原籍。北宋政和六年（公元 1116 年）曾有诏文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 30 驿。”古代一驿 30 里，30 驿为 900 里。可见北宋的地理回避制度以 900 里为限，其概数即为千里。北宋的这种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至明代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理回避和亲属回避，其次还有师生回避、拣选回避、科场回避和审判回避。

到明代便成为非常严格的重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一般文官必须避籍、避亲，即不得在本籍或原籍做官，有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机构做官；如果出现了籍、亲

方面的问题,则须迅速调整,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机构做官的亲属中职位低的官必须调往别处;避籍避亲之处,以远为好,如有的朝代规定避人他省者要离本省边境五百里以上,等等。有时还严格规定任满必调,防止官吏原地“坐大”,盘根错节,尾大不掉。这可以叫做“避任”,即不得连任。

明代回避制度颇严,规定实行大区域回避,即北人官南,南人官北。清代的回避制度打破传统的按行政区域划分的做法,改以五百里为限,即官员虽在外省做官,但与原籍、寄籍在五百里以内的地区,都得回避。应该回避的官员,本人隐瞒不说的,降一级调用。如假报亲属、师生关系,或里程不实,借回避之名挑选官缺的,按规避(逃避)例革职。

清朝对于官员地区回避的规定分为京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外官(地方政府官员)两种情况。京官的地区回避是指出任户、刑两部司官和道监察御史者的籍贯,不得与所管省份相同。之所以作此规定,除了因为这些职位都属要害部门外,还由于这三个衙门都以省名设司、设道,并各按所称省名辖理或监督所在省份的钱粮、刑名等事。既然诸司、道的职司均与所名省份关系直接,为防止弊端计,于是便有像浙江籍人不得充任户、刑两部浙江司和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等职务的规定。外官的地区回避是指自总督(相当于省长)、巡抚(相当于地区的行署专员)至州(相当于市)、县官,不许以本省人任本职,有的虽非本省,但本人原籍与所任地方相距在五百里以内,也得照例回避。清朝初年,需回避的官职还仅限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正职;后来回避的范围逐年扩大。有的人因迁居他省,

属于长期寄籍者。对于这些人,乾隆七年规定,无论原、寄籍,“均令回避”。另外还有一种人存在原籍和祖籍的问题,原则上也是原籍和祖籍都回避。

为了保证监察职能的公正实现,中国古代还实行监察官任职回避制度。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唐宋以后回避制度趋向严格。唐代宰相杜佑之子杜从郁被任命为谏官左拾遗。便由于遭到反对而改任他职。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或曾任官、寓居处所等地,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若案件牵涉仇嫌,主管监察官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者。

回避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根本解决结党营私弄权的问题,但究其用意,仍应充分予以肯定,而且这一制度也十分值得我们加以借鉴,以避免官员的乡土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回避制度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较之历代更全面、更具体、更严密;二是满洲官员较汉官为宽;三是外官严于京官,文官严于武官,内地严于边疆,内陆严于海防。

回避制度是我国古代在任用官员时,为了避免亲友邻里请托徇情,制定出一定的限制规范,以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古代出书也“炒作”

如今出书，无论是书商、出版社还是作者，似乎都免不了“炒作”。用现在的专业术语来讲，这叫策划营销。在中国古代，出书同样不乏“炒作”，成语“一字千金”、“洛阳纸贵”等都是因出书“炒作”而来……

### 吕不韦开“一字千金”先河

吕不韦是战国末期卫国人，早年以经商出名，后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但吕不韦能为后人所记住，更多的并不是因为他发了大财当了大官，而是《吕氏春秋》这本书。

《吕氏春秋》又叫《吕览》，“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是先秦时期一部百科全书式作品，全书约 20 余万字，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此书并非吕不韦亲自操刀而成，而是他组织门客编纂的。

吕不韦有“三千食客”，各种人才都有，所以《吕氏春秋》编纂并没有费多大力气。但书编好了，并不为当时学术界和文化圈儿所认可，于是吕不韦发挥了他的商业才能，决定炒作、推广《吕氏春秋》。

他让手下将书的内容张榜公布，贴在咸

阳城门口，旁边挂出布告，大概内容是，如果哪位能在《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里增加一字，或是减少一字，立即奖赏千金。此即《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所说的，“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成语“一字千金”，即由此而来。

### 左思靠名人效应“炒作”

《三都赋》是晋代畅销书作家左思的代表作品，创作前后整整花了十年时间。

左思当时并没有名气，所以《三都赋》写好后也不为当时的文坛所注意。当时著名的文化学者陆机甚至取笑左思，不相信他能写出好作品，打算亲撰《三都赋》。但是左思并不甘心，遂找到了当时当红作家、《博物志》作者张华。左思向张华讲述了《三都赋》的写作经过，张华深受感动。细阅之后，也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真的觉得《三都赋》写得不错，张华遂将《三都赋》推荐给名气更大、更有“话语权”的文人、医学家皇甫谧。

皇甫谧十分赏识左思，对《三都赋》评价很高，还亲自为此书作序。在皇甫谧的支持、

操作下,当时朝廷的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等分别给《三都赋》作注。

凭借张华、皇甫谧等一班文化名家的影响力,《三都赋》名声大振,为当时洛阳人青睐,成为当时最佳畅销书,时人竞相传抄。一时间,洛阳城内纸张价格大涨,由原来的每刀千文涨至两三千文,不少人只得到外地买纸回来抄写《三都赋》。成语“洛阳纸贵”,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 李梦符与“钓竿悬鱼”

在中国古代,没有“稿酬制度”,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润笔费”。在文人日子最好过的盛唐时期,获取“润笔费”是当时文人谋生的主要手段。

唐代一些文化名人热衷于给别人“树碑立传”,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不菲的“润笔费”。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文章巨公”韩愈,“为文必索润笔”,他给韩宏撰写《平淮西碑》,得酬“绢五百匹”。

五代时期的文人李梦符就曾通过“行为艺术”来卖诗。据北宋吴淑《江淮异人录·李梦符》所记,李梦符是后梁开平初年人,他在洪州(今天江西南昌)时,“尝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唱渔父引,卖其词”。李梦符的另类炒作果然奏效,名气远播。

### 宋代文人与“打广告”

中国图书炒作最热闹最受重视,应该在宋代,当时活字印刷术已广泛使用,出版业发展了起来,“打广告”式炒作开始流行。

当时的文人穆修十分欣赏韩愈、柳宗元的作品,得到韩、柳二人的善本书后,决定出版他们的文集。据南宋朱弁《曲洧旧闻》记载,穆修“自镂版鬻于相国寺”,意思是,穆修自费

刻印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在相国寺一带出售。穆修采取的炒作手法是“以赠促销”,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

宋代图书营销炒作最常见的手法 and 现代差不多,主打“质量牌”。除了打“质量牌”,有的还打“温情牌”、“诚信牌”,把纸张规格、数量、工价等相关信息印刻在书中,通过公开书的成本,明码标价,取信于读者。当时还出现了导购“图书广告”,把书的主要内容、特点告诉读者,以便选购时一目了然。现代图书前面的“内容简介”,即源于宋代这种“导购广告”。

当时有规模的书商都会在出版的书上印上自己的标记,即所谓“墨围”,有别于别家出版的书籍,形成“品牌效应”。

### 元明清书商与“征稿”式炒作

元代李氏建安堂出版的《元诗前集六卷后集四卷》书页上,便出现了这样的字样:“本堂今求名公诗篇……”

到了明清时代,印刷出版已不再是宋代的新兴产业,成为商机无限的成熟产业。此时书商的炒作手法更为丰富,其中最值得一提、且影响到现代图书营销模式的,是“征稿”形式的宣传炒作手法。

明代天启年间,苏州西西堂书坊刻印《明文奇赏》一书,便在书上印上了征稿启事:“愿于征者,或封寄,或面授,须至苏州阊门,问得书坊西西堂陈龙山,当面交付。”

这种以“征稿”为名的宣传炒作手段,清代书商运用起来更自如了。清代著名文人、书商李渔开有冀圣堂书坊,他在出版《资治新书》初集时,书上便有“征文小启”:“名稿远赐,乞邮致金陵冀圣堂书坊。稿送荒斋,必不沉搁……”



## 在临潼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姚敏杰  
(2014年4月22日)

各位领导、各位修志同仁：

大家早上好！

今天，临潼区在这里隆重召开全区档案地方志工作会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进一步推进第二轮《临潼区志》的编纂工作。在此，我首先代表市地方志办公室，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临潼作为西安东部发展的副中心城市，是西安历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素有“华夏源脉”之称。尤其是近几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市前列。就地方志工作而言，临潼也始终居于全市的前列。首轮修志完成后，区委、区政府就未雨绸缪，积极部署并开展二轮修志工作。特别是去年年初以来，在新任局长段永宏及牛主编的带领下，区志办积极组织调研，借鉴碑林、长安等兄弟区县在志稿编纂和部门初审的经验，结合临潼实际，制定了《临潼区志》分志稿初审方案。通过多次卓有成效的志稿解析评审与观摩学习，有力推动了志书编纂的步伐，探索积累了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提高了志书的编纂质量和审美层次。

目前，西安市区县二轮修志工作已经进入第二阶段，总体进展情况良好。《碑林区志》《户县志》已经出版，《灞桥区志》《雁塔区志》已经报省志办终审，《蓝田县志》也通过复审。

按照计划，《临潼区志》将于今年6月底前报市志办复审。总体看来临潼区的进度尚可，但距离志稿复审、终审和志书出版，最终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还有一定距离。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我认为还需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做好总纂工作，加强与区志各承编单位的沟通，严格核实资料。务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资料系统，考订无误；

二是要合理科学地安排好复审、终审和出版前的工作计划。做到按计划行事，有条不紊。特别是合理科学地做好人力与任务的分配，做到分兵把口，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司其职，把任务、责任落实到每一周、每一天及每一个人；

三是要对于操作难度较大的部分，区志办一定要及时与市志办沟通，尤其和区县志处加强沟通，共同协商，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各位领导、各位修志同仁，地方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人们重视的重要工作。在刚刚过去的4月19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

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希望临潼修志同仁，能够以此为鉴，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我相信，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临潼区各部门、各街办的通力协作和区志办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临潼区志》一定会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于2015年圆满完成编纂任务，修出一部无愧于时代、惠及后世的佳乘、名志。最后，借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我想特别提一点希望——在二轮区志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希望临潼区委区政府能尽快把《临潼年鉴》的编纂纳入议事日程，因为这也是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 在第二轮《西安市志·文物分志》 评审验收观摩会上的讲话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张帆

2014年4月17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修志同仁：

大家好！

刚才文物局黄局长和编纂组的同志介绍了《文物分志》编纂工作的组织过程和修编情况，审稿组两位代表分别从文物行业的视角和志书规范的视角发表了审稿意见，总体的看法是：第二轮《西安市志·文物分志》比较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91~2010年20年间西安地区文物事业的发展轨迹，并在记述上较好地处理了与首轮《西安市志·文物分志》记述内容的衔接。指导思想明确、观点正确、篇目构架基本合理、地域特色鲜明，注重图照与表格对文字记述的配合作用，语言平实流畅，符合志书体例和行文基本规范。尽管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大醇小疵、瑕不掩瑜，志稿从总体上已接近成熟。根据审稿组的综合评价，在此，我谨代表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宣布：第二轮《西安市志·文物分志》通过初审。

应该说，《文物分志》作为整个《西安市志》34个分志中第一个通过初审的分志，是我市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的一个标志。这是市文物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全局上下通力合作、修志人员笔耕不辍的共同成就，更是全市地方志工作的一件喜事。借此机会，我首先代表市地方志办对《文物分志》顺利通过初审验收表示祝贺，并对市文物局长期以来对地方志工作尤其是市志编纂工作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为进一步提升《西安市志·文物分志》的编修质量，使其成为我市第二轮市志的一个精品分志，刚才审稿组两位代表在充分肯定《文物分志》编修质量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会上审稿组只是发表了综合意见,很多具体的、细枝末节的问题没有摆到会议上来。会后,请审稿组与编写组重新找一个时间,再次对审稿意见进行讨论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稿方案,进一步严把政治关、保密关和史实关,尽早完成修改完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编写组的同志包括在座其他分志的主编们,分志通过初审并不是大功告成,只是说明分志稿基本满足了入志条件,还有不少的问题和不足有待我们继续修改完善。即便完成了初审后的修改工作,在之后的分卷总纂合成、复审和终审等环节中也许还会发现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各分志主编们继续配合。可能只有到整个《西安市志》定稿成书的那一天,我们才能真正地放松下来。不得不说,咱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当然,分志定稿后的工作将主要由我们市志办牵头完成,大家只是协助和配合的工作。)

按照我市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的总体规划,2015年将整体转入分卷总纂及送审出版阶段。市志编修工作能否按此规划顺利推进,关键在于34个分志的成稿进度及质量。之所以今天的评稿会专门邀请其他分志牵头单位前来观摩,正是为了学习借鉴文物分志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和进度意识,推动编纂工作进程。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地方志办公室谈几点想法:

### 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加强对修志工作的再认识

盛世修志,古今皆然,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我市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自

2009年9月全面启动以来,到目前已经开展了4年半的时间。在全市140多个承编单位、600多人的共同努力下,截至2013年底,21个分志初步完成分志总纂。但实话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分志稿质量还很差,远远达不到初审验收标准。修志工作不是难事,跟我们的GDP指标要求相比,跟我们各单位的中心任务相比,它一点儿也不难。但是,志书作为记述一地全貌的史料性宏篇巨作,它既对记述范围的要求很全面、很宏观,同时对记述事物的要求又很琐碎、很具体,离不开全市各行各业的通力合作。据我们了解,当前,仍有不少单位存在对修志工作重视不够、协调不力、人员不足等问题。希望在座各位主编把文物局修志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带回去,反馈给单位的分管领导乃至主要领导,取得他们对修志工作的进一步支持。请转告他们,修志工作依法而为,这是我们各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推不脱、赖不掉的,该是那个单位的事就是那个单位的事!希望所有分志牵头单位包括全部承编单位站在为国修志、为民立言、为事业树碑的高度认识修志工作,科学安排、责任到人、保障到位,确保于今年年底之前圆满完成分志总纂任务。

### 二、立足精品,扎实开展编纂工作

质量是志书的价值所在,生命所系。第二轮市志上下限之间各项事业发展变化快,消亡和新生的事物多,记述难度较大,任务繁重,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组稿、编纂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们要始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严把质量关,抓好编纂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在现阶段,一是要熟悉规范性要求。二轮市志编纂工作开展以来,市志办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希望各承编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学习领会，多方搜集核实资料，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撰稿。尤其是各分志牵头单位，一定要站在所在行业全局的角度，优化分志篇目，记清记全反映事物的关键要素和发展脉络。二要科学制定撰稿改稿方案。《文物分志》之所以能够在起步晚的情况下，从 30 多个分志中脱颖而出率先成稿并通过初审，就是由于文物局制定了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编纂工作方案。三是要重视评稿审稿过程。分志稿评审是每个分志从成稿到分志稿达到初审验收标准的一个重要程序，需要分阶段、分层次多次组织实施，别想着一次性就能解决问题。本次评稿会之前，《文物分志》已经经过多次内部评审，评稿形式既有集中组织会议，也有分头分类征求意见；参与人员既有行业专家，也有地方志工作者，分志稿经过编纂小组的反复修改打磨，才有今天大家认可的质量。所以说，这次评稿会，既是对文物分志志稿质量的一次“会诊”，也是整个市志所有分志牵头单位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评议，能够使我们看到志稿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明确存在的问题，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案并修改完善奠定基础。今年，全志 34 个分志的总纂工作即将全面完成，部分分志将进入分志总纂稿评审阶段。为确保志稿质量，市志办会全力配合分志牵头单位做好分志初审工作。具体分工是：市志办负责审核分志稿篇目的科学性和内容记述的规范性，分志牵头单位负责史实记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三、通力合作，确保完成修志任务

地方志编修，横陈百科，内涵丰富，是一

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系统工程。如果哪个部门和单位不能按时完成编纂任务，所在分志将无法总纂；如果哪个分志不能通过初审验收，分卷总纂工作也就无法顺利启动。本轮修志工作得到了绝大多数承编单位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但是也有一些单位对此项工作关注不多，用心不够。目前没有完成的分志，主要就是因为少数承编单位没有按时完成初稿，或者初稿质量太差，影响了整个分志稿的总纂合成。希望以此会议为契机，在全市、尤其是分志牵头单位之间形成你追我赶、相互支持、有效配合的修志局面，确保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高质量地如期完成。（拟召开市志编纂工作分部类培训会，时间大致安排在 5 月底 6 月初，请各位主编提前梳理当前存在的问题或困惑，届时一并讨论解决。）

同志们，盛世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现阶段我国的修志工作 20 年一次，能参与修志是人生的一件幸事，不论是担任组织工作的部门领导还是参与编纂工作的主编主笔资料收集人员或主审，也不论是专职地方志工作者还是兼职或返聘的行家里手，都应有一份自豪感和担当意识。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拼搏奉献精神，开拓进取，务实苦干，拿出最佳状态、最高水平，确保圆满完成这一轮修志任务，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 吴义勤副市长调研西安市地方志工作

3月20日下午,市政府吴义勤副市长、周爱全副秘书长等一行到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调研指导工作,实地察看地情资料室,了解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并召开了座谈会。在听取了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对我市地方志工作情况简要汇报后,吴副市长对市地方志办公室近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吴副市长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对市志办今后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把确保史料客观、准确、专业和科学作为地方志工作的根本

和第一要务,以对历史、后人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编史修志,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他指出,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二是通过网络信息化拓展、延伸地方志工作职能。将志书资料通过网络向社会大众公开,扩大志书阅读层面和服务范围,并通过网络检验、提升志书质量。三是地方志工作人员要有强大的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撑,耐得住清苦寂寞,静心、专心做好志书编纂工作。

## 《灞桥区志》复审会召开

《灞桥区志》复审会于2014年3月21日在灞桥区召开。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张帜,灞桥区常务副区长刘其智,《灞桥区志》复审组成员及该志全体编纂人员参加了会议。

《灞桥区志》复审稿上限1994年,下迄2010年,全书共38篇,120余万字,由灞桥区地方志编委会人员历时10年辛勤编纂而成,于2013年8月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复审。

## 临潼区2014年档案地方志工作会暨业务人员培训会召开

2014年4月22日,临潼区2014年档案地方志工作暨档案地方志干部业务培训会召开。应邀出席会议的有西安市档案局副局长赵路明、指导处处长王文利,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区县志处处长彭栋为;各街道、区级机关各部门、区级各直属企事业单位、驻区单位的分管领导和干部约200余人

参加会议。

会上,区档案局局长、区地方志办主任段永宏作《解放思想 创新服务 促进档案地方志工作持续发展》报告,回顾总结了2013年档案地方志工作,安排部署了2014年工作。市档案局副局长赵路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区委副书记李晓明分别做重要讲话。

姚敏杰同志讲话指出,2013年临潼区在地方志工作方面领导重视、措施得力,连续两年把二轮修志工作纳入全区综合目标考评范围;区志办积极组织协调,大胆创新工作,特别是在全市首创区县志初稿三审验收制度,有力推进了区志编纂进度;区志编辑部和各修志单位克服重重困难,收集资料撰写志稿,区志编纂工作总体进展顺利。最后他还就临潼区2014年的区志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李晓明同志要求各修志单位要加强总纂

资料的补充完善工作,按照2014年地方志工作方案和总纂工作的要求,对照总纂篇目大纲搜集、补充、完善资料。特别是要做好考证资料的审核工作,保证资料的真实和准确,不允许有错误的资料入志,保证按时报送终审稿。完成与市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是各修志单位一把手的责任,不得有半点马虎。

区志副主编马文雅做了题为《地方志资料的搜集、补充与完善》的业务培训。

(临潼区志办 马文雅)

## 《西安市志·文物志》通过分志初审验收

2014年4月17日上午,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召集的《西安市志·文物志》(1991—2010)评审验收观摩会在市政府召开。市地志办、市文物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参会,全市33家分志修编单位的主编(主笔)到会观摩。

作为分志牵头单位,市文物局在2012年11月已率先完成了文物分志初稿,后经两次修改,于今年3月递交了第三稿。这次初审验收会,由市文物局纪委书记唐世广主持,市文物局副局长黄伟介绍了第二轮文物志修编的组织工作,《文物分志》主笔、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自力研究员介绍了《西安市志·文物分志》初稿、第二稿、第三稿的编写和反复修改的基本情况;之后,由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馆长张礼智研究员代表文物系统的专家,对《西安市志·文物分志》发表了评审意见,接着市志处杨军亚处长代表市志办审稿组专家发表了审稿意见。

最后,市地志办张帆副主任作了总结发

言,综合两个审稿组的意见,认为第二轮《文物分志》比较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91—2010年20年间西安市文物事业的发展轨迹,并能与首轮《文物分志》做好衔接,指导思想明确、观点正确、篇目构架基本合理、地域特色鲜明,图文并茂,语言平实流畅,符合志书体例和行文规范,尽管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志稿从总体上已接近成熟,根据审稿组的综合评价,代表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宣布:第二轮《西安市志·文物分志》通过初审验收。《文物分志》成为整个《西安市志》33个分志中第一个通过初审的分志,是西安市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的一个标志。

唐世广书记最后还代表文物局感谢地志办及各位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并表示要再接再厉,继续做好下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西安市文物局 季现中)



## 古代的 人工降雨

《水经注》中有一段关于三峡地区古代土著“祈雨”的记载：“天旱，燃木崖上，推其灰烬，下移渊中，寻即降雨。”“祈雨”蕴含科学道理：降水需有凝结核和足够的饱和水汽，崖上，渊中，在局部较封闭地形，通过燃烧木材使得空气上升形成上升气流，气温降低，水汽易达到饱和状态，从而形成降水。

从皇帝到知县，每遇天旱，都要设坛祭

祀。古人的人工降雨方法首先要筑一个高台，“作法者”手持特别明亮的宝剑和八卦镜对准天空的某个方向做各种奇异的动作。其实这是一种刺激“含水云层”产生摩擦的做法。古人在人工降雨时请壮汉擂鼓、敲锣。这方法是为了让声波刺激云层产生摩擦。正是由于光波和声波的刺激，云层中才能产生电，正负电荷又产生水。

### 『学富五车 才高八斗』 的含义

人们常爱用“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来称誉或形容他人的知识渊博、才学高深。它们分别出自两个典故。“五车”出自《庄子·天下》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说的是战国人惠施方术甚多，却杂乱不纯，而且言而不及。所谓“其书五车”是指他的藏书丰富可装五车。古时的书都是用竹简(片)制成的，每片上刻有字，串起来就成了书。当时的五车书虽与现在的五车书不可等量齐观，但拥有五车藏书也可谓“饱学之士”了。“八斗”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称颂三国魏诗人曹植时用的比喻。他

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后来人们便把“才高八斗”这个成语比喻文才高超的人。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可叹》诗中写道：“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即曹植)八斗才。”诗中就借用了“才高八斗”这个典故。



## 「椿萱」原来指父母

“椿萱”，在传统文化中有约定俗成的含义，在特定的场合，椿、萱已经不是两种植物，而是代指父母。这种称呼自有其来源。在《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一段话：“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极长寿的椿树，就被后人借用为长寿老人的代称。又由于在《论语·季氏》中，有孔子的儿子伯鱼“趋庭而过”接受父亲教诲的记载，后人遂将“椿”和“庭”合起来，将父亲称为“椿庭”。萱就是“萱草”，又写作“谖草”，萱草的花蕾就是金针菜，又叫黄花或黄花菜。由于在《诗经·卫风·伯兮》中有“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的诗句，而按汉代学者对

这句诗的解释：“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就是说，谖草是一种忘忧草，如果种在母亲所居住之处就可以令人忘忧。因此，后人取其美好的联想意义，就把母亲称为“萱堂”，或简称为“萱”。就这样，“椿庭”和“萱堂”就成了父母的代称，有时又将父母合称为“椿萱”。

“椿萱”这样的雅称一般在正式的祝寿场合使用，为父亲祝寿可以称作“椿寿”，为母亲祝寿则称“萱寿”。后来，人们将此意推而开来，凡是为父辈的男性祝寿，都可以用“椿寿”来祝福，为母辈的女性祝寿，都可以用“萱寿”来祝。

## “寻常”本是度量单位

很多人都不知道，“寻”和“常”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最早的度量方法是伸开双臂，双臂之间的距离称作一寻，一寻乃八尺。同样的度量单位还有“仞”，一仞也是八尺。古书中常常形容高山为“万仞”，读者朋友们可以自行换算一下高度。“倍寻谓之常。”也就是说，“常”是“寻”的两倍，即一丈六尺。

汉语中有个反义同词现象，即一个词既可以指正面，又可以指它的反面。“寻常”连用就是这样，既可以比喻短或小，又可以比喻长或更多。《左传·成公十二年》载：“诸侯贪冒，侵欲无忌，争寻常以尽其民。”杜预注：“言争尺丈之

地，以相攻伐。”杨伯峻注：“寻常意谓尺寸之地。”《国语·周语下》载：“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韦昭注：“五尺为墨，倍墨为丈，八尺为寻，倍寻为常。”这里的“寻常”是比喻短或小。《淮南子·主术训》：“于此毫末，于彼寻常矣。”这里的“寻常”又用来比喻长或多了。

因为“寻”“常”是最普遍使用的度量单位，“寻常”一词便引申出平常、普通的义项，比如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名句。同时“寻”“常”又是经常使用的度量单位，又引申出经常、平时之义，比如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 中国古代第一个有年号的 和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建都西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年号的皇帝是西汉武帝刘彻。

刘彻(公元前 156 年—前 87 年),西汉的第 7 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汉景帝子,公元前 140 年—前 87 年在位,在位 54 年,是在西安历史上建都各朝代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16 岁登基后即建立年号叫“建元”,中途更改年号 11 次,共有年号 12 个。中国历史上建立年号始于汉武帝,以后历代帝王仿效这种做法,都建立了年号。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辉煌业绩,为巩固皇权,汉武帝建立了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解决

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击溃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首开丝绸之路、首创年号,兴太学。现代人们常说“重振汉唐雄风”,其中“汉”字即指汉代武帝而言。汉武帝(汉朝皇帝)即刘彻。

汉武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晚年穷兵黩武,又造成了巫蛊之祸,征和四年刘彻下罪己诏。公元前 87 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今周至境内),享年 70 岁,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 建都西安登基最年幼的皇帝是谁

建都西安中国历史上登基最年幼的皇帝是西汉昭帝。西汉昭帝刘弗陵(前 94—前 74)系武帝之子。即位时年仅 8 岁,是在西安建都继位最年幼的皇帝。

当时执掌大权的是霍光,代为发号施令。由于前朝创下了巩固江山,昭帝虽小,而天下仍是国泰民安。14 岁的昭帝察众臣忠诈善恶,坚定地站在霍光一边,其在位十三年间,始终委任霍光,不疑其忠心。在首辅大臣霍光的主

持下,武帝晚年重新施行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百姓生活比以前富裕,使汉朝出现了中兴稳定的局面。班固赞:“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元平元年(前 74 年)四月癸未,身体一向不好的昭帝于未央宫病死,享年仅 21 岁,在位 13 年。六月壬申,葬于今咸阳城西 6 公里处秦都区平陵乡大王村,谥号孝昭皇帝。

## 《终南山》



◎ (唐)王 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缭绕，变幻莫测的奇妙景象；颈联写俯视，从咫尺山水见万里之势，突出了终南山的辽阔、景象的千形万态；尾联写诗人自己，流连忘返，以至于天晚欲找人家投宿。

### 【背景】

开元二十九年(741)，王维回到京城后，曾隐居终南山，该诗当作于这一时期。

由于终南山靠近帝都长安，达官显贵、风流雅士凡在长安待过一段时间者无不游览终南山，又无不诗兴大发，吟咏这瑰丽无比的风光。据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有关终南山者，在1500首以上。但诗名直书“终南山”者，唯王维一人耳。王维倾慕终南山美景，后来索性在蓝田辋峪内购置了别业，长时期地在那里住了下来。他在辋峪写下了大量山水诗篇，表现那里千变万化的奇景。王维“山水诗人”的美誉也由此而来。后世公认，唐诗写终南山最多最好的是王维，而王维写终南山的诸多诗篇中尤以《终南山》一诗最具代表性。

本诗以作者的游踪为主线，对终南山的美丽景象进行了生动描绘。首联写远眺，用夸张手法勾勒出了终南山的高峻、宽广；颌联写近观，采用了互文见义的手法描写山中云雾

### 【赏析】

诗歌的艺术创作，贵在以个别显示一般，以不全求全，刘勰所谓“以少总多”，古代画论家所谓“意余于象”，都是这个意思。作为诗人兼画家的王维，很懂得此中奥秘，因而能用只有四十个字的一首五言律诗，为偌大一座终南山传神写照。

首联“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先用夸张手法勾画了终南山的总轮廓。这个总轮廓，只能得之于远眺，而不能得之于逼视。所以，这一联显然是写远景。

“太乙”是终南山的别称。终南虽高，去天甚遥，说它“近天都”，当然是艺术夸张。但这是写远景，从平地遥望终南，其顶峰的确与天连接，因而说它“近天都”，正是以夸张写真实。“连山接海隅”也是这样。终南山西起甘肃天水，东止河南陕县，远远未到海隅。说它“接海隅”，固然不合事实，说它“与他山连接不断，直到海隅”，又何尝符合事实？然而这是写

## ●历代诗人咏长安●

远景,从长安遥望终南,西边望不到头,东边望不到尾。用“连山接海隅”写终南远景,虽夸张而愈见真实。更多唐诗欣赏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唐诗三百首栏目。

次联写近景,“白云回望合”一句,“回望”既与下句“入看”对偶,则其意为“回头望”,王维写的是入终南山而“回望”,望的是刚走过的路。诗人身在终南山中,朝前看,白云弥漫,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景物,仿佛再走几步,就可以浮游于白云的海洋;然而继续前进,白云却继续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可即;回头看,分向两边的白云又合拢来,汇成茫茫云海。这种奇妙的境界,凡有游山经验的人都并不陌生,而除了王维,又有谁能够只用五个字就表现得如此真切呢?

“青霭入看无”一句,与上句“白云回望合”是“互文”,它们交错为用,相互补充。诗人走出茫茫云海,前面又是蒙蒙青霭,仿佛继续前进,就可以摸着那青霭了;然而走了进去,却不但摸不着,而且看不见;回过头去,那青霭又合拢来,蒙蒙漫漫,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联诗,写烟云变灭,移步换形,极富含孕。即如终南山中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泉,奇花异草,值得观赏的景物还多,一切都笼罩于茫茫“白云”、蒙蒙“青霭”之中,看不见,看不真切。唯其如此,才更令人神往,更急于进一步“入看”。另一方面,已经看见的美景仍然使人留恋,不能不“回望”,“回望”而“白云”、“青霭”俱“合”,则刚才呈现于眉睫之前的景物或笼以青纱,或裹以冰绡,由清晰而朦胧,由朦胧而隐没,更令人回味无穷。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明说,但他却在已经勾画出来的“象”里为我们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第三联高度概括,尺幅万里。首联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和从西到东的远,这是从山北遥望所见的景象。至于终南从北到南的阔,则是

用“分野中峰变”一句来表现。游山而有“分野中峰变”的认识,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之状已依稀可见。终南山东西之绵远如彼,南北之辽阔如此,只有立足于“近天都”的“中峰”,才能收全景于眼底;而“阴晴众壑殊”,就是尽收眼底的全景。所谓“阴晴从壑殊”,当然不是指“东边日出西边雨”,而是以阳光的或浓或淡、或有或无来表现千岩万壑千形万态。

对于尾联,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有些人认为它与前三联不统一、不相称,从而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辩解说:“‘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阔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姜斋诗话》卷二)沈德潜也说:“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卷九)

这些意见都不错,然而“玩其语意”,似乎还可以领会到更多的东西。第一,“欲投人处宿”这个句子分明有个省略了的主语“我”,因而有此一句,便见得“我”在游山,句句有“我”,处处有“我”,以“我”观物,因景抒情。第二,“欲投人处宿”而要“隔水问樵夫”,则“我”还要留宿山中,明日再游,而山景之赏心悦目,诗人之避喧好静,也不难于言外得之。第三,诗人既到“中峰”,则“隔水问樵夫”的“水”实际上是深沟大涧;那么,他怎么会发现那个“樵夫”呢?“樵夫”必砍樵,就必然有树林,有音响。诗人循声辨向,从“隔水”的树林里欣然发现樵夫的情景,不难想见。既有“樵夫”,则知不太遥远的地方必然有“人处”,因而问何处可以投宿,“樵夫”口答手指、诗人侧首遥望的情景,也不难想见。

总体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是善于“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